



## 中美智库高层论坛

时间：2015年4月21日 13:30-18:00

地点：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层报告厅

主办：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齐晔：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关于智库发展的论坛，我们要谈的是中国以及前世界的智库发展情况。在过去的两年当中，智库一直都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术语，而且也吸引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兴趣。我们认为，智库在政府作决策的时候会发生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公众和私人领域也是如此，这不光是一种共识，也成为了一种尝试。过去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呼吁发展新型智库，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我们知道，智库本身不是一个什么新的事物了，它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越来越连接到一起，整个社会体系、经济体系的复杂程度在不断增加，我们也认识到了对于利用智库的需求，也就是“外脑”来帮助政府作出正确的决策。

今天我们会专门来讨论一下关于在中国的智库发展，并且去了解一下从世界的其他地区的智库发展中能吸取怎样的经验。

谈到智库的发展，像布鲁金斯学会以及清华大学这样的机构必须是不得不提的，他们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知道，他们本身就是在这方面的领袖，他们在中国和全世界都是伟大的思考者，他们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和我们一起讨论，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我想在这里介绍几位，包括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女士，傅莹女士和我们一起进行了圆桌的会谈讨论，她也特别关注智库之间的沟通交流的重要性，我们有请她在今天下午离开之前给我们讲几句话。

傅莹：谢谢，我没有作太充分的准备来做这个演讲。今天中午我们进行了非常活跃的讨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现在还在开会，所以今天下午我还要回去讨论。但是我首



先要祝贺今天这个论坛的成功举办，也是非常高兴听到了一些建议、一些智慧，这些想法能够从我们的讨论中得到。

中国现在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改革就需要好的建议和好的想法，需要人们的智慧，同时也需要了解其他国家，从其他国家当中去学习。在中国，中国的智库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是离我们说的“现代的新型智库”或者说“当代的智库”，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或者要做很多事才能达到新型智库的水平，也是中国政策制定者所提出的水平。我们需要更好地来提供政策建议，我们要能够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政府的政策意图。

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困难，当然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之处，其中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有一个政策的顾问中心。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困难，比如在这种形势下，有些东西我们是不了解的，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能认同的，比如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我们和其他国家还是有很多区别，我们也承受着一些压力，还有就是语音上的困难，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一些概念在中文里听起来非常好，非常让人感到有吸引力，但是翻译成外文之后可能就丧失了它的意思，比如“青城汇仁”（??），我现在也不知道把它翻译成英文怎么翻最好，比如“四个全面”，这个“全面”应该怎么翻？所以，我们如何去翻译，如何把自己的这些概念通过一些世界能够理解的方式去翻译，这也是中国遇到的一个特殊的困难。对于中国的智库以及中国的这些学会和研究机构来说，他们不断地去发展，能够实现现代智库的标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变化，中国发生的变化以及世界发生的变化和预期的变化。我们不光要知道政策制定者的想法，还要知道世界上其他人的想法是怎样的。所以，我预祝今天的论坛能够圆满成功。

齐晔：谢谢，非常感谢傅莹女士。刚才您提到，因为现在您的事务非常繁忙，还要提早离开去参加人大常委会，但是非常感谢您和我们分享了您的智慧和见解。

说到智库，我们有两大智库必须要提，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是中国第一名的智库，共有 4000 名研究人员，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规模。再有就是布鲁金斯学会，它是来自美



国的一个学会。今天的嘉宾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李扬教授和布鲁金斯学会执行副主席 Martin Indyk，欢迎两位。

刚才傅女士提到沟通交流的重要性，抱歉，刚才我这边没有做好沟通的工作，我之所以想让两位再稍等一下，是因为我其实不是特别擅长去主持这样的讨论，但是我今天有很好的帮手，有请非常美丽、非常优雅的来自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田薇女士。

田薇：非常感谢齐教授，感谢您刚才热情洋溢的邀请，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主持。在刚才齐教授邀请我的时候，我在想，之前采访了很多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今天能够见到他们，我感觉到非常激动、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有来自中国和美国的智库，特别是有着布鲁金斯学会，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么重要的讨论，讨论中国所发生的，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公开场合所强调的智库的发展。我今天的任务就是我会给大家介绍发言人，这两位主旨发言人有一个互动环节，他们能够让之后的发言人更多地发言。

首先我来介绍第一位主旨发言人李扬先生，李扬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您上台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以便让朋友们更多地了解。李扬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也是前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是产业金融研究基础学院委员会主席。李博士在经济领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也是国务院常务会议列席成员，并且参与中央国内国外重要金融问题的战略决策和战略制定。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李扬先生能和我们在一起，因为李先生在很多国际和国家的金融组织方面也有非常多的建树，比如世界银行、经合发展组织、亚洲银行等等，他和相关官员有着很好的沟通和联系。今天他到了一个跨文化的讨论空间，我们也期待李先生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有请李扬副院长。

李扬：大家下午好。既然是中美对话，我用中文说。

刚刚傅莹女士已经说到，在中国建设智库是件新事物。但是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员及我的体会是中国的文化中古已有之。大家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位于建国门内，那



个地方是清朝、明朝的贡院，再往旁边是翰林院。有人说，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是过去的翰林院，翰林院就是智库。中国的传统是说文死鉴、武死战。就是说，你是一个文官，你是一个出主意的，你是一个智库，就必须把你的意见坚持到底说给皇帝听，直至死去。武将你要用你的武力、你的武艺保家卫国，直至战死，这是中国智库的传统。至今中国社科院还保留着这个传统。所以在讲智库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是整合，绝对不是说在中国重新建立智库。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来说明中国智库运行的一些特征。

中国社科院有很多种方式来发挥智库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研究所和研究人員会参与各个层级的国家政策的制定，像我曾经服务过的金融研究所，我们就非常深地卷入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各项政策的制定过程，我本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很多具体的货币政策制定的活动。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比如最近我们公布的“中国制造 2025”，也就是“更新中国制造”这样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我带领我们的工业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金融研究所和财政经济研究所都参与了这个计划。像这种事情很多，就像在我们院里，很多研究所都是对应着国家的政府部门而设立的，国家有工业管理部门，我们就有工业管理研究所；国家有农业部门，我们就有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家有金融部门，我们就有金融研究所，这是我们发挥智库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第二，我们会参加很多政府制定大政策的活动。大家知道，中国每年有三个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两会，在那个会上，政府总理会做工作报告。还有一个会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每一届都会有一个新的议题推出，上两届推出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以及全面建设法治中国的决定，即将召开的五中全会将推出“十三五”规划的建议。第三是每年年末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决策者都会参与这个会，在这个会上会对未来一年的经济工作做出部署。所有这些会，它的起草组中都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参加，我们有很多研究人员是长期住在玉泉山上，中国人可能比较熟悉，所有文件起草组都住在一个像花园一般的明清皇帝的行宫里来起草这些文件。



第三个方式，我们会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上报系统，会有好多种报告送上去，其中最重要的报告只送给四十几个人看。这些报告会对当前国内外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分析，并直言不讳地提出我们的看法，当然会对政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四个渠道，就是我们会作为教师，去给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的官员们授课。中国最高档次的课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讲课，讲课的内容涉及到很多，非常广泛，在讲课中，我们很多人会参与。

第五个渠道就是我们会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影响决策者，影响舆论，影响普通观众，影响外国人。

我这样举例之后大家就会发现，中国智库有中国特色，我们如果说智库的功能都是要影响政策、影响舆论，我们有我们特有影响政策和影响舆论的方式和渠道。

但是，当下确实中国的这些智库面临着改革，因为我们不是特别适应当下国内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在全球中的地位，我们必须进行一些改革，目前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进行这些改革。改革的方向大致上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对我们的机构做一些拆分，刚才有人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美国人对全球智库的排名中排名亚洲第一，当然肯定是中国第一，但是它是把我们 4000 名研究人员、39 个研究所作为一个整体去排名的，我们这 4000 人里有研究哲学的、有研究经济的、有研究宗教的、有研究诗歌的，这样一些人都在一起来发挥智库功能显然有点混淆，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分，我们不要把研究诗歌的人和研究货币政策的人放在一起去发挥智库功能，我们应当让他们专业化，当然他们现在都在专业的研究所里，我们有 39 个研究所。现在为了面向智库的功能在整合，现在已经整合了 11 个智库类的研究机构，不久我们会挂牌，然后开始运作。

第二，我们的治理机制要调整。现在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一个事业单位，相当程度上像政府机构，我们所有的经费是来自财政拨款，我今天中午得到好消息，今年我们的财政拨款增加了一个亿，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 18 亿人民币的拨款。这样一个拨款使得我们可以体面地从事研究。因此我们这些机构就不以市场化、不以外面去拉经费作为它很重要的工作。但据我所知，我的同行们，像我到布鲁金斯访问过两次，我知道对他们来说，筹



钱是第一位的任务，因为我们有政府拨款，所以筹钱的任务就没那么紧迫，当然我们在政府拨款之外也要争取企业或国外的资助，但这并不构成我们主要的资金来源。但是这样也束缚了我们，我知道在像布鲁金斯以及其他这样一些世界著名的智库里，它获得的资金都是非限定性的，就是给钱，但是我不必然为你说话，这是智库运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但是我们拿钱，不能不为政府说话，这个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如何处理好我们独立、科学地为党中央、国务院服务，其实是始终萦绕在我们头脑中的大问题。当然我们这些年处理得很好，我们有 4000 人天天在外面发声，没有产生重大的冲突，说明我们在这方面处理得很好。我们始终抱着建设性的态度，我们和社会上的很多研究人员不一样，我们看到了问题，但是我们除了指出问题之外还会建设性地指出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只是简单的发现。

第三个要整合的是国际合作。应当说，我们社科院这么大的机构基本上是内敛的，我们为自己服务，我们没有为世界服务的任务。比如和清华相比，我们的国际交往就没有这么多。当然我在院里管国际合作，我们每年大概有 4000 人次的来往，规模也是非常大的。但是从智库建设的角度来说，从进一步沟通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前年开始我们启动了智库合作项目，每年我们会选择若干人到我们选定的全球最重要的智库去工作，在布鲁金斯现在还有两人在工作，你们有一位副总裁，当时我去谈，他说，你们来人可以，每年 4 万美金，你来了，我给你们打点折，每年也要 3 万美金，需要有这样的安排。我们每年有 10 个人左右会到这些著名智库工作，实际地参与他们的智库活动，实际地在智库中把中国的事情说给他们听。这个星期我们要批准 2015 年的项目，以前做了几年，产生了一些结果，但是对于中国当前的国际责任来说、对于我们当前国际交往的任务而言，还是太少了。

第四个就是宣传。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们把自己立足在科学的基础上，做科学的就不要宣传。我们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宣传？我做这个东西很好啊，我就是做给自己看，我很舒服啊。中国过去有“士”的传统，我干吗要你批准？为什么要你同意？你要作一个



智库的话，显然要抛弃这种心态，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成果广泛地通过现代媒体传播出去，下一步我们的智库建设，媒体化、网络化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第五件事就是我们要建立一套与现代智库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包括薪酬体系、用人体系。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薪酬体系可以保证大部分人衣食无忧，但是难以保证能吸引来特别是从国外吸引来高级智库的研究人员。我们的年平均收入是 15 万左右，据我所知，要想找比较好的研究人员，恐怕得七八十万、上百万，我们现在的财务制度是不允许的，你要这样做的话就违规了，中纪委就要查你。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智库的时候，就需要在用人方面改革，我注意看布鲁金斯有各种各样的用人方式，有长期的、短期的，我们都要尝试。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智库予以支撑，中国的智库体系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科学院研究系统之外，大学、各级政府和党的机构的研究机构，还有现在风起云涌般地成长起来的民间智库，这都是好多支队伍，这些队伍恐怕是需要顺应发展的方向，突出自己的特点，来共同为中国的智库事业贡献力量。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需要加强同包括美国智库在内的国外智库的联系。实际上我已经去过两次布鲁金斯，在那儿做过非常深的调研，其他智库也都有，今天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来学习，我想把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

谢谢。

田薇：非常感谢李院长的介绍。看得出来，我们是在进行改革和思考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实际上，我觉得您对您的很多同事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模范，因为我记得您在很多国际会议上和国际智库进行沟通以及和媒体沟通，作为媒体一员，最开心的就是听您说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是媒体化和网络化，真是一个好消息。

感谢李院长，正如李院长刚才说的，很多研究人员都在玉泉山上工作，这个山上是有玉泉水。现在我们要换一下，我们说到了改革、说到了玉泉山，现在我们到了华盛顿的杜邦中心，现在我们要请 Martin 上台。在我们邀请 Martin 上台之前，提醒一下听众，明年是



布鲁金斯学会重要的一年，因为今年是他们 99 年的纪念日，明年就会布鲁金斯学会 100 周年纪念日，这是一个非常卓越的成绩，我们期待布鲁金斯有更多的成就，在中国与我们的智库能有更好的合作。现在我想邀请布鲁金斯学会执行副主席 Indyk 先生，曾经也是以色列大使，担任克林顿政府顾问，同时也是总统特殊助理，现在我想邀请 Indyk 先生上台。

**Martin Indyk:**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非常荣幸能够再次回到清华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我要感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院长邀请我，我们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合作关系已经有 9 年历史了。

习近平主席说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智库所起到的重要性，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智库发展的方面，我对这个领域非常感兴趣，因为这是一个独特的时刻，习近平主席三次强调智库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白皮书，谈到了智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不记得其他国家的主席或者总统曾经强调过智库的重要性，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说一下美国智库的经验。

我注意到，当习近平主席在说到智库的时候，他说到智库要有中国特色。我在这儿也是希望能够去学习，刚才李副院长也说到中国的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智库。我仔细听了 he 刚才的发言，实际上与美国智库的一些经验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有一些区别还是值得在今天讨论的，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家可以互相学习。

我们布鲁金斯学会是有美国特色的一个智库，对于中国智库来说，也许你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关性。到明年，布鲁金斯学会有 100 年的历史了。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最久远的独立的学会，原始的机构是兰德公司，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为美国空军进行合同方面的研究，甚至在今天，大多数兰德公司的工作也是合同的研究，为五角大楼工作。布鲁金斯学会的成立是能够利用外界的一些专业专长，比如一些大学和经济学家，能够用这些专长为华盛顿、为美国政府提一些建议，能够了解美国以外的一些情况。在美国的环境下，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布鲁金斯学会不做受托研究，它希望从外部的角度来影响政府，因为政策决策过程的性质，这在美国做起来比较容易。大家知道，美国政府有权力分治，比



如我们的总统和内阁、国务卿、国会，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当然我们还有司法机构，他们负责我们的司法、法规。因为我们在权力之间的平衡和分治，我们有政府的不同部门，政策方面的专家去影响或者参与不同的政府机构的工作，这是比较独特的，甚至在西方的民主社会里，很多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权力分治。

说到美国的智库影响能力或者建议决策者的能力，美国每四年都会选举新的总统，总统可以连任两届。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总统可以连任八年，现在奥巴马总统的八年任期快要到了，我们在 2017 年时将会产生新的总统。智库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每一个总统候选人必须要制定政策，这些政策要接受公众的点评或者媒体的评价，因此每一个总统候选人都会寻求一些专家的政策建议，这些专家主要都来源于智库，因为智库的职能就是要提供这些政策建议。如果当选了总统之后，这个总统也就会把整个政策建议带到他的这一届政府当中，并且要拿到高层的政策决定层面，这也是非常独特的一种，不光是离总统最近的这些政策建议者的建议会进入白宫，也会看到不同的政府部门从白宫也会获得这个政策。同时，总统也会任命一些人，比如支持他的政策的人，把这些人指派到政府当中不同的职位，不光是在内阁这个层面，而且包括内阁以下各个部门的层面。你会看到这样一个流程，智库的这些人可能每四年到八年就会入职到政府部门当中，也就是说能够带着他们的政策想法进入政府部门落工作，然后再把这些建议真正制定成政策，这是非常直接的方法，也是智库去影响政策决定的一个非常直接的方法。比如克林顿总统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指任了我，他可能是喜欢我的口音吧。（笑）

我是从澳大利亚来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来自中东方面的专家。在克林顿总统上台之后，我进入了他的建议顾问团队，成为了中东问题的专家。之后还有一个发言人也会说一下，他在克林顿总统这一任期上作过亚洲问题顾问。我们从政府出来之后又进入了布鲁金斯学会，当时克里是想找人做巴以和谈的事情，去年我来做了。这样的情况我们称之为“旋转门”，也就是说，从智库的专家进入政府，希望能够实现他们的政策意见，然后从政府里又回到了智库，基于他们的经验去做更多的研究，可能之后会再次回到政府，这其实也是美国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其他国家很少见，但是它却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能够让这些



智库的专家不光去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同时能够在政府当中真正去制定政策，这也是美国非常特别的一点。

布鲁金斯学会作为最古老的独立智库，要基于科学的方法以及历史的分析、研究进行深入的政策研究，从而拿出一些政策建议。所以，布鲁金斯作为一个智库所做的工作和这些大学所做的研究是不同的，大学做的是纯学术研究，它们不一定会直接成为政策的建议，但是布鲁金斯学会专家的一个工作条件就是必须是和政策相关的研究，必须要做和政策制定相关重要性的研究工作，做这种深入的研究工作，然后拿出一些政策相关的想法、建议，这也是整个过程中比较困难的一部分，大多数研究对象或者观众是这些政策制定者，不光是政府官员，当然政府官员是最主要的受众对象，同时也包括社区，因为这些社区也会影响到政策的制定。还有其他一些智库的专家、记者，比如有些记者会专门撰写关于政策的相关内容，还有关于政策的评论人员，当然还有国会的参议员，有这些政策制定相关的工作人员。还有与外交政策相关的，比如使馆、境外政府和境外智库，这些都是我们的听众，这些组成了最广泛的听众。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内圈”的听众，这种内圈听众是和华盛顿直接相关的，但是在过去的五到十年中，我们观察到两个变化，也是把整体的基本受众群作了一个改变。一个是互联网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因为忽然之间互联网给了我们这种能力来做及时的沟通，可以说是零成本的一种沟通，如果你去和出版、传播相比的话，互联网这种通信和沟通可以说是能够触及全球范围内的听众的，而且我们的潜在市场也由于互联网而大大增加了，所以我们就有机会能够影响全球世界范围内的思考，这既是一个大的优势也是一个劣势。比如，在 Twitter 上可以输入 150 字，每周可以触及的人可以达到上百万、上千万，这点也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但是它对政策的影响是怎样的？这 150 万的受众都是什么人？他们和政策制定有什么关系？所以一方面，互联网能够让我们接触到更广大的受众，但是它的影响却非常难以估量，更不要想去具体测量出来，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和发展。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会注意到华盛顿的政策制定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过程，它的讨论有些时候是非常两极分化的，华盛顿的政策制定有时候会丧失它的职能，要想通过立法是非常困难的，即便



有些时候已经通过了，但是可能在法庭当中被拒绝。这样一种两极化的观点争论也带来了两种现象，一种是积极的，一些智库不光要考虑华盛顿，还要考虑各个州的政府，希望去影响他们，因为他们能够以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去做决策，也就是一方面我们能接触到全球的受众，但是我们又从当地各州的层面来影响政策的决定。还有一个可能不是这么积极乐观的发展，就是华盛顿这种两极分化的观点会产生一种游说型的智库，他们并不是要做深入的研究，也不是依照科学的论证方法做深入研究，他们所做的就是要推动某一个政治观点，去游说。有一个例子，传统基金会就是保守派的观点，所有他们的学者都是基于同样的假设来做的，他们当然会非常有效率，所以他们建立了一个相应的研究机构，但是他们还要平衡遗产，这样一种游说型的智库当然看上去可能更有效率，但是它却好像是从空气中占用了太多氧气。但是对于像布鲁金斯学会，我们就不会对于某一个具体问题只游说某一种观点，而是我们需要保护这些学者的权利，他们应该做学术型的、独立的研究，在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环境下也确实是比较难做的一个工作。

我再说一下关于预算、关于资金的问题。布鲁金斯学会所获得的资金很少一部分是来自美国政府，这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和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能够正确地批评政府，我们的融资来自慈善基金会，在美国这种基金会规模很大，而且在融资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这是我们资金的一个来源。再有就是个人资金的来源，这部分涨得很多，很多美国的亿万富翁都给我们投钱，当然我知道中国也有这种亿万富翁。他们不光是给布鲁金斯学会提供资金，还给很多其他的智库提供资金。第三个融资渠道就是企业，当然，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营利，所以涉及到给智库提供资金的时候，他们会考虑从底线上来说能给他们带来什么。这时候可能有一种尴尬，因为智库必须要维持独立性，他们不可以去推动某一个公司的利益，这样让这家公司更加营利。我们也会有很多方式去建立这种“防火墙”，尽量不要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就是外国政府提供的资金，有些人可能觉得不应该拿境外政府的资金，因为有可能会影响最终的研究结果，但是只要学会的独立性能够得到保护，我们也没有理由不去拿境外政府和企业的钱，最关键的是这些学者的独立性不要由于这个资金而首先影响。关于境外政府的融资，当然在政治



上是比较敏感的，比如美国政府就喜欢给各种各样的 NGO 和全球智库投钱，也不能说我们要坚持一定要其他国家、其他政府给我们提供资金的支持。这基本上是美国智库的运行方式，最重要的是在资金提供者以及这些学者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让学者不要受到资金来源的影响，能够去做独立的研究。另外一方面就是资金来源的多样化，这样就不会只依赖于某一个来源的资金，不管它是从本国政府还是其他国政府或是个人、企业来的，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有非常广泛的资金来源，从而确保你的这些研究学者能够得到保护，并且有自由地来做独立研究工作。我相信习近平主席也是在这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也强调了智库在中国的发展当中所起到的独特的重要作用。整个智库行业和智库领域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进行政策的讨论以及政府政策的执行，它也影响到全球范围内的各个国家。中国在很多方面现在也起到了领导的作用，来发展智库，体现了智库的重要性，在这上面我也非常感谢。

田薇：非常感谢 Martin Indyk 刚才对于美国特色的智库的描述，接下来有请李院长。

好的演讲者不光讲得全，而且讲得特别有意思，我们会有一个 20 分钟的互动环节，我也想接着刚才你们两位所说的一些观点继续来说。首先还是说一下智库的本质，Martin Indyk 先生提到了多党的特性，有些时候在美国这些智库是多党派特性。李先生提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国务院直属的特性。在这样的一个特征之下，刚才 Martin 先生提到了“防火墙”，它到底会如何影响智库所提供的政策建议？以及在整个政策制定过程中，它会在你的文化背景下发挥怎样的作用？如果说得太笼统了，我可以举一两个例子。比如在美国，人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重返亚洲战略是什么样的意思？奥巴马政府在亚投行方面是怎样的政策想法？智库在这些政策当中起到什么作用或者说没起到什么作用？

再请问李先生，“一路一带”也是这届政府提出的重要政策，智库在这些政策中起到哪些作用？或者提供了哪些非常重要的政策建议？



**Martin Indyk:** 谢谢。刚才主持人提到两个非常具体的例子，非常有意思，中午我们和傅莹女士吃饭的时候也谈过这个话题，重返亚洲政策是由奥巴马总统的政策顾问在他竞选当中提出来的，是想强调这样一个想法，他们会改变布什政府完全关注于中东的情况，当然美国也参与到阿富汗和伊朗的冲突当中，美国被吸入了“中东漩涡”。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重新平衡，因为现在在世界另一端，中国的崛起、印度的崛起、亚洲经济的发展，这是地球另一端正在发生的事情，而美国在这个过程中是缺失的。

**田薇:** 李院长，很多人对中国非常了解，我们现在不光是去改变了一些词汇，我们现在是要了解到智库是什么，或者对于我们的管理智库起到了什么作用。改变对于上一届政府在政策方面所导致的结果的纠正，至少有一些措词上面的改变，比如亚洲中心等等。很多学者，包括布鲁金斯学会也与中国学会也提到了要重新平衡亚洲，我们也说到，这实际上是改变了一些措词，并没有改变它的本质，像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智库，它的作用是什么？

**Martin Indyk:** 我们说到“中心”这个词，中心现在已经从中东转移了，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我们有了一些政策，一些政策方面的专家都来自于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些专家也说到。现在两国政府在措词上也下了一些力气，现在美国对于亚洲的外交政策也有一些变化，这是智库的一些建议。

**田薇:** 比如 AIIB，华盛顿会认为这届政府实际上并没有紧跟着世界的脚步，现在智库的作用是什么？像布鲁金斯这样的智库，有没有给政府一些建议或者是推动了一些事情的发展呢？



**Martin Indyk:** 这个情形是怎样形成的呢？智库确实是给出了一些建议，这个方法是自然而然的，有官员参与，希望能够去保持这个游戏的一些规则，比如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其他的一些机构。

**田薇:** 我并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智库的参与，但是我了解到一些关键的人物，实际上智库给政府的关键人物提供建议，这对案例分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建议。李院长，您认为呢？

**李扬:**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先作两个评论。我想，中美智库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但是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它发挥作用的条件和路径是不同的。我到华盛顿去，除了布鲁金斯，那边是基金会，那条街上都是智库，它影响的就是那些议员们，这是它的一种政治制度。在中国，你绕着中南海一圈都进不去，玉泉山也不给进。所以我想，功能相同，制度不同，这就构成了我们双方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第二个，我们现在都在谈智库建设，千万不要把智库神化。我们知道，过去很多的坏主意也是智库出的，而且不少，翻开历史一看，国外有，国内也有，所以我们的功能还是尽可能把智库做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至于“一路一带”的问题，这恐怕要从中国的决策过程说起，中国的决策过程就是某个领导或者某个部门反反复复地在不同阶段请你去征求意见，像“一路一带”，现在是一条线，至少我们院对陆上丝绸之路做过长期研究，应当说现在的很多研究是基于我们的材料。我们院有很多机构你看着和智库不相关，比如研究历史的，他在这样的问题上会提出非常独到的见解，他会告诉你这条路走不通，历史上就有人走过没走通，你现在也走不通。

“一路一带”提出之后，在中国的政策体系里会交给发改委落实，发改委搞了厚厚的一本方案，里面有很多投资项目，这个方案又拿到我们那儿去征求意见，我们给它提了很多意见，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意见就是，“一路一带”是合作，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应当把立足点放在合作上而不应该放在仅仅去投资，把我们的钱给用出去，这个建议被接



受了，现在大家看关于“一路一带”新的表述是表述为它是一个合作。我们的决策程序就是这样的，不断地开会，文件给你，让你提出意见，就是这样一种方式。我想，形式不一样，但是决策逐渐民主化是一个实质的进展，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的最大进展就是决策的民主化，在各个环节上都会找有关人士来讨论，这是中国智库发展最大的一个环境。

田薇：用例子来说话可能是最好的方式，在“一路一带”政策出台之后，各方面的思想库有很多论证，就像您所讲到的，在中国，思想库有非常多的形态，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论证，但是能有新意的论证很少，能够真正为政策提供方向性、导向性的新观点很少，更多的是重复以前别人曾经讲过的。所以，作为媒体来讲，有时候也觉得有些挑战。想请教一下，这样一种中国智库的形态，您觉得怎么能真正改变和提高？

李扬：基于我们的经验，还是要有研究基础，要有队伍。你现在有很多“自称自许”的智库，就是拉了一笔钱，然后找几个人在天天说话，这种不是智库的主体，现在有很多，你昨天还不知道他，今天他到处去发言，而且都是请别人来发言。我觉得，智库要有自己非常优秀的领军人物，这个领军人物要有一支非常稳定的合作团队，背后要有非常好的数据库支撑，如果需要模型的话，还有一套模型在运转，我们现在基本上按照这样一种要求来构造我们的智库。当然我相信，各种各样的智库都需要，有一些政策需要我们这样的智库，有一些可能需要“天天冒叫”（音）的智库。不好从政府的角度说这个可做、那个不可做，市场竞争嘛，经过竞争，适合的就留下来，不适合的慢慢的就不做了。

田薇：您刚才在演讲中也提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非常特殊的形态，你们的研究资金全是来自于中国政府财政拨款，一方面要给出比较独立的、有见解的政策性建议，与此同时，现在这样一个资金来源也是现实，那么，您怎么来把握这个平衡？



李扬：也就是独立性和科学性。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我以前当所长的時候体会不深，现在当院长了，体会很深，经常会有电话从中南海打过来，说你们怎么这样说？我们于是就要为这个事情开会，很厚的一本东西，我们把它从头到尾看，然后说他哪个地方说得不妥当，但是有些地方说的是对的，我们仍然坚持，其实这种例子非常多。我想，尽管是政府给的钱，但是政府没有说一定要如何如何，它希望我们做出独立的、科学的研究。比如中国人口政策，我们从上世纪就开始呼吁，我们有好几个人因此被处置，说你反对国家的国策，今天我们的建议证明是对的，这在我们的历史上非常多。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是“科学院”，所以我们坚持我们的科学性，这样才能对得起这个国家，对得起院长。

田薇：作为院长，神经也要非常强大才行。

李扬：对，我们不怕电话从中南海打过来。

田薇：Martin Indyk 先生，您刚才说到了布鲁金斯学院的资助，也说到希望多方能够支持您的学会的资助。您也提到，你们不再得到兰德公司的资助了。您有非常强的研究能力，但是资金对您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当有国家的政策不让你去接受境外政府资助，比如当你和你的同事在中国讲智库的时候，说到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您觉得对于您来说，说到我们学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您对资助有什么样的想法？

Martin Indyk：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学会的领导要考虑的事情。当然，像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样的情况就可能比较容易一些，我们只要收到支票就行了，当然18亿人民币更好了，要是能够从政府获得资助当然会简单一些。但是我们布鲁金斯学会一开始的立场就是我们应该独立，而且要保护我们的这种独立性，不能光是接受单一的资金来源，不光是获得美国政府的资金支持，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其他的资助者，这对我们来



说是一个问题，省得政府到时候跟我们说你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如果我们有私人资助者或者基金会资助的时候，上周我们有一个私人资助者，这就像做生意一样。就像李博士刚才说到的，我们需要让这些学者去做他们自己的研究，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个判断必须要基于他们的研究，而不应该是一些宣传或者意识形态上的。作为机构领导，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研究者，去创建这样一个“防火墙”，我们需要明白智库的职责，如果你只有一个资助方，那可能就有问题了，他可能会让你做一些事情，因为智库不是去取悦他人的机构。

田薇：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两位嘉宾，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在变化，中国和美国的职责在国际社会也是在变化，因此中国和美国的智库能够起到什么作用？特别是在制定影响到双方的政策方面起到什么作用？因为有时候这些政策非常微妙，我想请嘉宾能够用一两句话表达一下你们的一些想法。

Martin Indyk：说到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时刻，这个时刻有巨大的变化，有非常大的冲突以及恐怖组织的威胁，等等，影响了我们的国土安全。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利益，能够促使大家一起来共事，能够使面临的这种情况更稳定，推进和平，推进繁荣发展。对于全世界的人来说，所有人都希望去推进和平、推进发展。

说到布鲁金斯学会，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中国中心，我们也有中国的专家，是由李成先生来带领。另外，我们有布鲁金斯-清华中心，我们有这两个中心来影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对于美国的未来，对于世界的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智库，我们也致力于推进中国、美国之间的关系，共同去面对这个世界的问题。

田薇：刚才李扬院长的演讲中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们更多的是向内看，并没有为世界服务，但是现在角色要转变了吧？



李扬：对，我同意 Indyk 先生的看法，我说三个词：第一是我们要相互理解；第二是相互尊重，我们越是研究越是发现，中美双方有很多文化是不相同的，两种文化不能够说谁更好，因此我们要彼此尊重；第三是要合作，我们致力于践行这三句话。

田薇：有点像外交部的辞令，但是想一想，这里面的内容确实是现实。

非常感谢 Martin Indyk 先生和李先生对于上一个环节的参与，接下来请上分论坛的主持人和分论坛的各位嘉宾。

中国特色智库：中国需要怎样的智库？

王莉丽：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首先我会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王莉丽，我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今天这么重要的活动并且主持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分论坛。我是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这是一个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智库，并且受中国人民大学的资金支持。

首先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第一位嘉宾是著名的清华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著名的中美专家刘亚伟教授，Arthur Kroeber 先生是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非常驻资深研究员，他的研究专注于中国与全球经济。

今天在座的所有嘉宾应该非常了解，中国从 2009 年开始就进入了一个智库发展的黄金时代，到了 2015 年 1 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下发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文件。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个问题请三位嘉宾回答的就是，我们这些年其实都在讨论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希望每一位嘉宾都能谈谈你们的想法，因为



今天在座三位有中国智库的专家、管理者，也有美国的，也有咨询公司负责人和研究者，非常多元。请问三位，你们怎么理解“中国特色”和“新型”这两个核心词汇？

胡鞍钢：智库，全世界比较一致性的，它毕竟还是思想库，作为政府决策重要的外脑，这个功能差不多。不同的可能还是从这么几方面讨论，首先我也同意刚才李扬讲的，国家制度还是不一样，这是根本性的，因此每一个国家的智库和它的制度环境是相关的。

第二，客户也不一样。我们就是两大客户，一个是直接为党中央、国务院服务，一个是确实为人民服务，它不是中产阶级，并且也形成了我们自己自身的文化，就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

第三个，更重要的，客户的价值也不一样。因为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客户，客户本身有不同的价值，这方面肯定中国和美国差异也比较大。所以我们是定位为给高端智库提供高端知识价值，而且我们这个知识界定为关于中国或者当代中国变迁的系统的、整体的、动态的知识，此外，我们也希望这些价值为客户在确定基本国策、确定发展战略，包括制定“十三五”规划时能够有所贡献。

第四个，还是要专，也就是我们强调的专业化，也强调我们在某些方面应该是一流的、专家型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其次还是要新，还是要提出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观念。我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十多年前我们已经提出中国进入 21 世纪需要新的发展观，我们把它界定为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但是到 2003 年 SARS 危机，当时我和薛澜院长都参加温家宝主持的会议，我们都提出中国的发展经济发展快，社会发展相对慢，应该实行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之后，国务院办公厅专门请我们讲课，我就突显地讲这个问题，后来没有想到，党中央提出的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因为我在科学院待过，用“科学”这个词我会比较慎重。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智库还是能够有它自己的思想贡献、知识贡献，特别是新的 ideas。我也和中财办的服务同志交流过，其实他们不缺信息，他们缺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不断地推出一些新的思想，比如最近我提出“共赢主义”，来区



别于 500 年以来的殖民主义，100 多年前的帝国主义，70 年来的霸权主义，就是中国崛起一定是共赢主义。

王莉丽：下面请刘亚伟教授谈一谈。

刘亚伟：中国建设新型的有中国特色的智库，我个人不太喜欢这样的标签，因为每次一说到有中国特色的，人们都会觉得他们要怎么样做，它好像是一个挺吓人的概念或者有些时候就是一个借口，我们和别人不一样。刚才李先生在讲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关于智库的职能，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智库，它应该做的是一样的，就是要影响政策的制定，关于它的区别，就是胡鞍钢教授说的，你如何影响、服务你的顾客，党中央、国务院是你的客户，但是要说你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胡扯，你应该考虑你是服务于某一个人群，Martin Indyk 先生刚才说得很清楚，智库的一个原则根本就是要保持独立性。美国智库和中国智库其实有很多区别，他们对于独立性的保护的差别是很大的，对于思想者的保护的差别是很大的。二是资金来源，美国有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在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 25 年，所有的资金都是来自于政府，最近这几年可能有很多钱来自于不同的渠道，比如布鲁金斯学会，肯定有一些资助是来自于企业的，清华也有自己的清华—卡内基基金会这样的智库。

最关键的是你到底是为谁服务的。往前看一个关键，说到新型的智库，也就是公共领域和私营领域合作的结合，比如人民大学的重阳金融研究院，它说自己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智库，但是它的钱包从哪儿来呢？它是一个私募给的钱，这个智库做什么呢？也没有一个清楚的界定，所以我觉得之后可能也需要有一些关于资金来源的披露，这也是监管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王莉丽：我想，我们的智库平台本来搭建的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观点呈现平台，下面请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非常驻资深研究员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来谈一下他所理解的“中国特色”和“新型”。



Arthur Kroeber: 我想先对胡教授和亚伟所说的内容说点感想。

如果回顾一下现在中国的智库在过去 30 年给中国做出的贡献其实是非常积极的,包括政策制定的过程,在中国它的整个机制还是比较好的,如果和其他经济情况可比的国家相比的话,中国智库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中国的智库在过去 30 年当中主要是自上而下地服务政策制定的过程,而且也是非常有效率的。现在所面临的挑战就是社会的属性和经济的属性,和这种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流程不符合了,利益团体和草根阶层与顶层政策制定者之间要有更多的互动,需要更多元化的渠道,听到草根阶层的声音,把它纳入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智库如何参与国内政策的制定并且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就像亚伟刚才说的,包括资金多元的来源以及智库到底是服务谁,你需要的不只是政府支持的这种传统型的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现在需要更多元、更独立的机构,它们的资金来源是不一样的,随着时间的发展,其中会有能够发展成为更加成熟的智库的模式,这是现在可以采用的一种方法。也就是现在需要多元化的服务模式,多元化的服务群体和多元化的资金来源。还有是要更加强调想法的传播,而不只是处在政府支持的循环中,你要考虑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像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美国主要智库,我们不光是有研究人员,还有政府背景的人,还有来自私营部门的,比如企业和一些支持组织的人员,人们会有不同种类的观点、多元化的观点,在会议期间,他们可以交流这种观点,能够有不同背景的人来说不同的观点。在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我们有这样的机构能提供这种平台,更加开放地交流不同的观点,这是非常适合的。比如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讨论了关于国际关系以及智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如何来改善国际间的互相过节,这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很多挑战是来自于国内的,中国现在每年有 800 到 900 亿的境外投资和很大胆的雄心广博的境外政策,和其他的国家有更紧密的互动,总的来说是非常积极、互利的,但是它也把理解的要求提得越来越高,首先在中国国内你要理解你到底是和哪个国家在打交道。



中国的智库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大多数是关注国内的，这在过去是适合的，但是一方面是需要资金的获得，另外一方面需要更多地了解国际的情况，不只是国际关系的内容，而是更多地了解其他的国家不同的情况。现在有两个挑战，一个是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要足够多元化，中国的智库应该更加开放，倾听这些关于国内政策的观点。再有就是更多地增加和其他国家的互动参与，因为中国也是以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

王莉丽：中国智库存在什么问题以及未来的模式已经谈了很多。为什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要谈论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的理解呢，我觉得中国智库近些年的发展一直在寻找一种中国模式，我在 2014 年 9 月份曾经就这个问题采访了布鲁金斯学会的董事会主席，他给了我一个非常简洁的回答，他说他所理解的“新型”就是中国智库将更加走向独立，那时我们的官方智库也更加强调独立性。他所理解的中国特色，他认为是对中国非常了解，知道如何在中国体制内运作并且高效完全工作的中国智库是中国特色的新型的智库。这一直让我印象很深，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刚才三位嘉宾实际上不仅仅在谈论对中国特色、新型的多元化的理解，其实他们的问题已经延伸到中西方智库运作的不同、我们中国智库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中国智库存在的模式。接下来根据三位刚才所谈论到的，我有三个问题请三位嘉宾进行评论。

第一个问题请问刘亚伟先生，我觉得中西方智库，尤其是中美智库，我们尤其强调我们要学习西方智库、学习美国智库，美国智库特别注重运作信息的传播，影响力通过各种媒体，传统媒体、新媒体，来提升它的影响力，不仅是在美国国内的，而且在国际的。比如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我们是在中国的北京探讨中国智库的问题，这本身是布鲁金斯在中国的影响力，是一个国际的影响力。因为您近些年很多时间在中国从事中美关系、从事公共外交工作，做出了大量推进中美关系的贡献，而且我也知道您在中国的一家智库——察哈尔学会担任客座研究员，您参与了他们很多活动。我想请您比较一下，在您在美国卡特中心和您在中国担任客座研究员的察哈尔学会，我们智库应该做哪些提升？



刘亚伟：实际上，卡特中心不是一个智库，如果你说它是一个智库的话，卡特总统会觉得受到了侵犯，因为他觉得我们是偏重于做而不是光去思考，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中心，卡特总统自己和美国政府在很多事情上都有一些分歧，特别是在中东或古巴、韩国的一些看法上面，他很多的政策宣传现在都变成了事实，我们要感谢他不懈的努力，因为他做了很多演讲，他说到了沟通。我觉得，实际上美国的智库和中国的智库没有什么区别，你可以看到，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先生他们有自己的微博、博客等等。现在我们在一个互联网时代，其实我觉得我们之间在沟通上面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中国的智库在这方面也大步前进，我看到了王先生的微信，他讨论了一些关于智库方面的事情。我觉得，沟通对我来说，我不需要讲太多。我想要说的一点是，我们是在中国这个体制里面运行，它的建议实际上影响到了智库的运行，因为我们住在中国，我们知道这个政策是怎样的，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独立，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领导在想什么，我的所思所想要去解释他们的想法是怎样的，而不是去做出一些批判。

王莉丽：刘亚伟教授谈到卡特中心是不是一个智库的理解问题，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从事智库研究的学者，从07年到现在一直从事欧美智库和中国智库的研究，因为刘亚伟教授是卡特中心的一员，也是卡特中国项目的负责人，所以他很有发言权，另外，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探讨，比如西方学者、美国学者、欧洲学者、日本学者对智库的定义是不同的，我们中国学者所理解的智库跟美国智库就有很大的不同，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和刘教授一起探讨智库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它的内涵、外延到底是怎样。

第二个问题请教 Arthur Kroeber 先生，您刚才提到了您对中国智库目前存在问题的看法，接下来我想请你梳理一下中国智库从09年到现在经历了高速发展的六年时间，美国有一家机构每年在做排名，我们现在的数量仅次于美国，中国智库的数量是全球第二位。但是在影响力上、在思想的创新能力上，作为中国智库的一员，也同时作为研究者，我个人



认为我们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和欧洲一流的智库还是有差距的。那么您觉得，具体到底是什么问题限制了中国智库的思想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Arthur Kroeber:** 我觉得，我们在不同的制度下去进行比较有什么作用？就像胡教授和其他嘉宾已经说到的，每个智库所处的社会制度都是不一样的。智库的作用或者构成，美国是比较明显的，政府在不停换届。对于我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不要去建立一个清单，比如美国是智库第一，中国是智库第二，后面还有第三、第四等等，实际上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政策挑战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机制去解决这些问题。智库是非常重要的，要回答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正如刚才所说，很多政策形成的过程在传统上是政府内部的流程，很长一段时间都运行得非常好，但是社会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现在有更多不同的利益团体或者说更多的声音要去发表。我知道在中国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改革，而且要发展地去看外界智库的模式，我们要向这些模式去发展，这有时候是有帮助的，但是更恰当、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关注我们这个时期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在过去 10 到 15 年里，因为经济的增长，有哪些声音我们没有听到，我们如何创造一种渠道让这些声音去发表他们的意见。因为中国有这样的文化，我们要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中国可以有这样的流程，关键是我们先要找出不同的政策，我们要听取不同的声音，我们有什么样的智库可以去使用，融入到我们自己的政策讨论当中。

**王莉丽:** 最后一个问题请问胡鞍钢教授的是，因为在座各位大部分是中国人，胡老师是从事国情公共政策研究的资深教授，从事了很多年，他们做的国情报告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年胡老师一直在充实关于中国智库模式的探索，所以今天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请问胡老师，您在这么多年的思索包括智库管理运营的实践中，您觉得中国智库未来应该走什么样的模式？刚才几位嘉宾也谈到了，现在智库的模式基本有美国模式、欧洲模式，亚洲是日本模式可以算一种模式，美国是民间智库独立运作，欧洲是与党派关系比较紧密，与政府的关系也比较紧密，在日本把企业化的运作和 NGO 的运作都列为智库



发展模式之中。到现在，在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我们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我们不断地在探索、在推进，我觉得中国智库的发展将成为中国能否真正和平崛起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现在世界各国的竞争已经从硬实力转向软实力，而中国智库的发展将是中国的软实力的关键的源头。所以这个问题，我知道很宏大，有点难为胡老师，但是也想请胡老师能够用简单的几句话分享一下您的一些观点。

胡鞍钢：第一个观点，两办的文件出来以后，其实中国已经进入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智库时代。因为我们做智库是 30 年前，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叫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不是正规的，是课题组。15 年前到我到公共管理学院，我们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当时我们也定位为能够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智库，不是美国智库、美国智库，当然我们也去学习其他国家的智库。2012 年，因为清华大学新百年开始了，所以清华大学经济将我们的研究中心进一步提升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别是今天听到介绍，明年布鲁金斯 100 周年，我们也依托清华大学能够建 100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智库，只要我们走这条道路，我倒不倾向于用“模式”，就是不断创新一个大学的智库，这是我们的一个任务。为此，其实我已经出版了两本重要的书，是讲我怎么做智库，并不是去讲什么模式。第一本书就是 2011 年清华大学正式出版的《国情研究与教书育人》，其实就是总结那个时期的一个经验。去年又正式出版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因此，实际上怎么建智库，我天天想。我们最近又编了第三本书，叫做《国情研究——大学智库》，更加去讲我们的实践和思考。这本书还没有正式出版，但是也引起了我不断地去思考这个问题。因此现在不是简单地用模式比较，就是你每天怎么去创新这样一个智库，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只是百花齐放中的一家。所以我想，中国智库从大类分是七大路军，中央文件已经规定了。作为大学智库，可能还要分不同的类型，即便像公共管理学院，可能是所有中国大学中公共管理学院中智库最多的，而且都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因此实际上我们现在强调的是智库群，而且要相互合作，同时也会相互竞争。此外，我们不仅是自己做研究，去年发表的内部国情报告一共是 75 期，正刊 50 期，超过 6000



字以上的深度研究的专刊 25 期，文字量将近 70 万字。我们一般不会编人家的书，也不会编人家的报告，比如刘博士有精彩的观点，我们也不会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是智库要自己原创性地研究。这些研究可以说留下了白纸黑字，为什么这么讲？党建读物出版社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已经正式出版了我主编的国情报告（1998-2011），一共是 14 卷，27 册，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收录了。此外，又出版了第 2012 年版，另外要编辑四部英文的国情报告。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智库，要有智慧、智实、智力，最重要的是要有高端的白纸黑字的知识产品，不管你叫什么，我们是留下了白纸黑字。

王莉丽：我很认同胡老师所提的从实践的角度谈中国智库怎么样去做，这让我又想起了布鲁金斯学会，因为我也曾经就是布鲁金斯的一员，曾经在 2007-2008 年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作过一年的访问学者，一直清楚地印在我的脑海中的是——质量、独立性、影响力，这三个是布鲁金斯的核心理念。实际上，我们在寻找世界各国智库怎样的发展理念，这三点是世界各国智库都会遵循的。我们今天探讨的问题——中国特色、中国需要怎样的智库，如果也是用三个词汇来表达的话，我们在寻找中国特色和新型的同时，在追寻我们的研究质量、创新性、更多的独立性和国内的影响力以及国际影响力。

非常感谢三位非常著名的嘉宾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接下来把十分钟的时间留给现场观众。

观众提问：我是财新网实习记者。刚才三位都不断提到中美智库都是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运作，在美国这样的环境中，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智库的建议，所以会为智库的运营提供机会。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每个领导人都会有学习的需要，但是没有制度要求他们每个人定期地学习一些信息，这是不是在建立中国新型智库的时候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胡鞍钢：因为我做智库，不面临党派的更替，只是领导人团队的更替，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是具有连续性的，比如为什么我说为民服务呢？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1998年我们比较早地提出来不是增长优先而是就业优先，后来成为基本国策。从本世纪以来，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 1.2 亿人，这就是我们本身的贡献。因此，无论是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还是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包括习近平同志任总书记，我们都提供了连续的研究。特别是去年 7 月 8 号，当时习近平请李扬和我，我就重点讲中国如何在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率下行的过程中不断地创造就业，因为它不仅是中国难题，还是世界难题。所以，的确，我们不是为下一个总统或者下一个党派服务，它还是具有政策研究的连续性，以及中国政策惠及千千万万的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包括农民工。

谢谢。

观众提问：我来自亚洲开发银行，我的问题是问刘老师。您提到现在很多机构都在说自己在做实践而不只是思想，从你的卡特中心的建立，如何来做实践？

刘亚伟：如果比较一下卡特中心和布鲁金斯中心，布鲁金斯中心应该是 8000 万美元的预算，支持研究员做基本的研究，去年是 1.2 亿的预算，很多都是现金，还有 4000 万的现金等价物，包括支持非洲疾病消除的项目。卡特中心的中国项目运行很像一个智库，在中国，我们在想，有很多是力所不能及的。

观众提问：我来自麦肯锡，我想问 Arthur Kroeber，刚才您提到智库要选择独立研究的话题，应该如何选呢？是资金支持者的意愿、政府的意愿还是支持力量？能否介绍一些例子？

Arthur Kroeber：其实我比较谨慎，我不想太多地使用“独立”这个字，因为有可能导致一些复杂性。现在中国应该有多样化的不同种类的机构，传统的政府机构将会持续扮



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找到更多的资源输入方式，去最大限度地使用他们的资源，倾听不同的意见、建议。第二个面临的挑战是可能有其他不同种类的机构，它们并不是直接附属于政府，但是它们也想参与到这个进程当中来，基本上你希望能够有大量的广泛的模式出来，有一些是游说型的、倡导型的，有一些是更广泛意义上的，随着时间的发展，它们会建立起一定的公信力，但是在现在的环境下，肯定也会有问题，比如政府关于这种独立融资机构的容忍度到底是多少？所以我觉得您应该考虑一下，政府融资的这些机构如何有更多的多样性，以及如何有更多独立的智库。现阶段不用担心它是否是科学的，因为中国这么大，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最好是使用多样的方法。

王莉丽：今天作为我个人而言，我真的非常荣幸能跟三位这样最优秀的嘉宾来进行智库的对话，今天有幸提问的三位现场观众也提出了特别建设性的问题。我在想，中国关于智库发展的探讨已经成为在中国的各个层面，不仅仅是精英界、政界高层，还有普通学生、社会各界的老百姓都在关注智库的发展，因为这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点，所以我想，我们的讨论将会继续下去，接下来的嘉宾的探讨会更加精彩。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感谢现场观众。

多元化的中国智库：新型智库如何突显自身独特性？

王辉耀：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非常高兴主持今天下午这个分论坛。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些年来进入了智库的阶段，进入了智库大发展的阶段，特别是两办发布了中国智库建设的意见以后，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开始。这可能跟中国智库的特色还是有关系的，中国本身的国情，国家很大，决策也非常集中，而且还相对比较高效，从上到下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存在西方国家的机制，比如反对党的机制、议论辩论等等，中国的智库如果很高效，能够充分论证得好那是有好处的，



但如果论证得不好，也会带来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危害。在中国还没有实现全面发展的情况下，智库就突显了它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决策机制上，过去 60 多年来是传统的模式，比如八大民主党派的模式、两会建言献策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智库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力量的推动，可能会带来中国更多的变化。所以智库在这个阶段得到相当大程度的强调和提倡，是适合中国这个独特的背景的。所以今天讨论多元化的中国智库，我们荣幸地请到几位嘉宾，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也是智库的资深专家；第二位是柯银斌先生，察哈尔学会秘书长，也是很知名的智库；第三位是共识传媒集团总裁周志兴，也是一个智库型的传媒机构。三位嘉宾都是非常资深的，对智库也非常了解。

我们有两个研讨空间，第一轮我想请嘉宾就中国智库的基本情况发表他们的见解，比如中国的新型智库如何发挥它的独特作用，比如为活跃中国的思想市场和政策市场做出贡献。我们知道，30 年前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引进了民营经济、引进了外资，活跃了中国经济的市场，现在我们建立中国智库，包括各类智库、包括民营智库，能不能也搞活中国的思想市场和政策市场？新型智库有哪些新？包括品牌建设和它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哪些特点？首先请李成博士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想法。

李成：刚才您讲了中国智库的春天即将到来，我想，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春江水暖鸭先知”，尤其是你们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们海外智库也随时关注中国智库的发展。

我觉得，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期，这个时期跟美国 50 年代、60 年代有点接近，原因应该还是比较清楚的，一方面是国际的，一方面是国内的，还有一方面是人才，这三方面正在促使中国智库的迅速发展。这里一个关键词是“多元”，所以我是同意 Arthur Kroeber 先生讲的，中国发展智库，也许独立性不是主要的追求目标，至少在短时间里是这样，也许多元性应该是它追求的目标。多元性也是基于国际环境更多的多极化，刚才 Martin Indyk 也讲到国际社会迅速变化，非常复杂，需要作为大国的中国对国际事务，包括经济的、能源的安全的、气候环境的等等，都有进一步的认识。而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变得非常多元。这使我想起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经说过的，怎么领导一个国家呢？有 247 种奶酪的国家，而中国也变得非常非常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有时候想的是一回事，民众是另外一种观点，这种沟通，需要智库起很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旋转门，我知道王莉丽写了一本书就是以旋转门作为主题。前段时间多是一些退休的干部到智库去工作，在未来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当中将会有一些更平衡的旋转门，一些年轻的、在智库工作的人也会不断地转到政府去，当然中国也有这种情况，像王沪宁、刘鹤（音），也是很好的例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到了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到了政治局顾问，所以这三种因素促使中国智库在迅速发展，而本身的多元又是中国智库的一个新的方面，所以我想在多元方面讲一下自己对中国智库的看法。

王辉耀：就像当年我们搞活经济市场多元化带来了中国经济市场的繁荣，我们在思想市场、政策研究市场如果也有多元化的话，一定会带来思想市场、政策市场的繁荣，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智库的作用不可小觑。

我知道察哈尔学会是研究公共外交方面非常资深的智库，从专业化的角度看，柯银斌先生您如何看待我们刚才谈到的问题？

柯银斌：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我理解，中国特色就是多元化，新型就是要创造新型的价值。作为多元化的中国智库，在活跃思想市场方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功能定位。我们知道，一个智库的功能可能有五项，资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并非所有的智库都要把这五项功能做齐了，有的就可以做一项功能，或者以某一项为重点。中国的智库是多元的，那么每一个具体的智库而言，它实现的功能应该是有重点的。比如党政智库，它资政谏言就是必须的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比如胡老师的高校智库，在理论创新方面肯定是比较擅长的。舆论引导方面，周总做得肯定比谁都好。在社会服务方面哪些智库做得好呢？这有可能是民间智库发挥长项的地方。察哈尔学会是做公共外交的智库，所以再说一句话，所有的智库都要做公共外交。



王辉耀：谢谢，确实，现在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也成为了大外交的一部分，智库当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座的其他机构也需要发挥更大的公共外交的作用。

周志兴先生是很知名的传媒界人士，是共识传媒集团总裁，这些年来在打造思想市场，特别是在智库方面提供传播平台方面也有很多贡献，我想听听您的高见。

周志兴：本来到清华大学想着语出惊人地说几句话，想了半天还是说不出来，我想，因为没有有一个智库来帮我写稿子。

刚才说到智库，王辉耀和其他许多人讲你们共识网就是一个智库，每次听到这个话我都是否认的，我们远远不是一个智库，我们甚至连个媒体都不是，我们只是一个有一点受众的网站而已。为什么请我到这儿来？我想是因为我最近去美国、去布鲁金斯去得比较多，所以李成就请我来了。我这三年每年都会去，都会见到布鲁金斯的领导们，我知道，美国的智库是我们心目中非常出色的一个智库，我想，中国可能在短期内不能像美国一样有这样的智库，但是中国现在在起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有苗不愁长”，有了这样的苗头就不愁长。

当然像日本的智库，我去日本比较多，日本的智库在资金上是比较充裕的，但是日本政府并不是那么听智库的话，不像奥巴马总统或者是克林顿总统，他们对智库是很尊重的。我去年在日本跟东京财团的人交流，我说，听说你们是安倍首相的智库？他们首先否认，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他说，我们是为日本人民服务的。后来我说，安倍去靖国神社，你们智库给他们出了什么主意了？他们说，我们说的话安倍不听。所以我想，每一个智库都不太一样，布鲁金斯在现在、在奥巴马这一届政府里，它的话语权格外强。

中国现在智库在起步，有很多智库。当然，如果说刚才李扬院长在这儿讲社科院是个智库的话，我们也不否认，刚才讲到多元化，我觉得这个概念不是清楚，多元化有几种多元化，一个是智库形态的多元化，比如有社科院？有大学的、有民间的，一个是智库思想的多元化，有这样想的、有那样想的，有这样说的、有那样说的，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需



要我们去做的，所以多元化并不光是形态的多元化，而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多元化，很多多元化的集合。

王辉耀：周先生从他切身的经验阐述多元化，讲得很好，确实，我觉得多元化也不光是形式上的多元化，包括思想、观念和探讨议题的多元化，智库多元化的开放对中国未来的科学民主决策会带来巨大的推动，第一轮的话题大家讨论得非常好，而且有一定的共识，下面一轮针对三位嘉宾不同的背景谈一些具体问题。

我们都知道，布鲁金斯历年排名都是世界第一智库，布鲁金斯的三大法宝是他们智库安身立命的根本。我想问李成先生一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智库如何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来建设性地给政府建言献策同时又不受政府的影响？第二个问题，现在很多中国智库的资金来源成问题，像美国的智库生态非常好，有基金会、有捐赠的文化，捐赠的法律法规也很健全，但是在中国这方面都处在萌芽状态，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家还处在捐大楼、扶贫救灾方面，他们还没有发展到捐智库这种最高境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智库发展缺资金的问题？

李成：确实，布鲁金斯把独立性看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您讲到我们的座右铭是三个词，王莉丽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讲到了，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但是我们不要把很多东西都神秘化或者太理想化，这是我们追求的理想，而布鲁金斯是信奉这个原则，但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智库都是这样，有很多智库和政府有很密切的关系，有的智库有非常强的意识形态，有的智库是为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服务的，这些都是美国智库的多元化。但是布鲁金斯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在独立性的问题上，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包括在两党选举的时候，我们不能以布鲁金斯的名义站台，也不能够用布鲁金斯的资金来为选举服务，如果你请了民主党的候选人，也要请共和党的候选人，包括最近布鲁金斯中国中心的介绍，以前是用了刘延东和希拉里的介绍，现在我们准备把希拉里的照片换掉，因为她又开始竞选了，所



以我们要有这个敏感性。而我们每年也要写一个保证，就是不用布鲁金斯资源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这方面都有很严格的规章制度在进行当中。

关于第二个问题，怎样发挥影响力，这也并不矛盾，我们当然希望通过我们的资源、通过我们的旋转门起一些作用，但同时我们看布鲁金斯的人员构成中，也许大多数是民主党派，但始终是有共和党的，我们保持了这样一个平衡，而这个平衡也是为什么中国布鲁金斯中心有影响力的来源之一。同时，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准则，有了这样一个文化，所以有很多人意识到应该赞助这样的智库，维持它的独立性对整个社会有利，对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有利，所以它是没有附加条件的捐款，它是相信你，而不是希望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你。正是因为这样，有时候很大的企业要捐助我们，我们是退掉的，包括有一个研究药物的企业要我们研究公共卫生，我们说不能这样做。这是你的政治文化，再加上美国对捐助的税务保证，使布鲁金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否则你很难想象 85% 的财经来源来自于捐款，能够使布鲁金斯能够发展下去。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在发生变化，加以时日，中国会出现中国的布鲁金斯、中国的卡内基，我相信在未来的 10 年、20 年当中就会出现。但是智库的发展是需要过程的，它不可能一下子成为世界第一或者世界最有名的智库，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学习他人的长处、学习其他人的经验教训，在这方面，我们布鲁金斯学会希望和中国的同仁能有更多的接触，而我们在中国的中心——布鲁金斯清华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王辉耀：谢谢李成，他说得非常好，一方面我们要保持智库的中立性、客观性，另外一方面，在资金方面，布鲁金斯得到的很多是不受限制的捐助，这样对它的研究是很有好处的。包括它的运营机制、它的管理，布鲁金斯对中国的智库建设提供了很多很有益的经验，特别是中国智库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将有很好的参考。

下面请问柯银斌先生，大家都知道，现在公共外交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记得前年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还讲，希望欧美同学会成为智囊团、人才生力军和公共外交的生力军。察哈尔学会智库作为一个公共外交很有特色的智库，你们在



开展公共外交方面如何进展？包括怎样推动中国民间外交的进程？你们还有很多出版物，所以这方面请您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

柯银斌：布鲁金斯学会有几个词，察哈尔学会 2009 年成立的时候也有几个词，叫前瞻性、影响力、合作共进，我们没有把“独立性”列在里面。但是其实我们是最独立的，你们是 80% 的资金靠捐助，我们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们没有政府的一分钱，也没有海外基金会的一分钱。独立性看怎么理解，如果从人才流动角度来讲，布鲁金斯是最不独立的，因为你们没有旋转门，智库专家到政府上班，政府的要员回到布鲁金斯学会任高级研究员，从人才流动角度来讲，你们并不独立，可能资金独立、课题独立。这是我对独立性的理解，我个人认为，独立性应该是独立的研究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才是独立性的本质，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们又是独立的。

察哈尔学会作为中国的一个非官方的智库，我们在中国一直在推动民间外交的方面，这从一点上我们给中国的民间智库提点建议。

第一，我们要做一点稍稍有前瞻性的事情，2009 年 7 月份当时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讲公共外交，我们 9 月份成立，之后就做公共外交。因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把公共外交定位为他们的主要职能，加上我们学会的创始人韩方明主席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所以把创办《公共外交》期刊的任务交给我们学会了，因为外事委员会要做，但是他也没有钱、也没有人，察哈尔学会作为这个杂志的承办单位，从此察哈尔学会在中国公共外交推广上一直在做，做到 2012 年，十八大报告里写上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第一阶段结束，第二阶段我认为还要更加专门化，所以从 2013 年察哈尔学会做公共外交，已经很少说公共外交这个词了，我们要说城市外交、企业外交、宗教外交、高校外交、女性外交、军事外交，这些更具体的公共外交形态。公共外交也许是水果这概念，我们下面要研究苹果、桔子、梨。我原来是研究企业战略出身的，所以我有一本书叫《立基战略》，小型的智库就必须抓住自己的立基战略，抓住以后还得集中全力、集中所有的资源做下去，不要东一下、西一下，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你看胡老师的国情研究，几十年来一直这么做下去。



第三，因为中国的机会确实很多，要专注一个领域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大家都耐不住寂寞，要跑到别的地方去试一试。如果有新的机会来了，我的建议是要把这个新的机会和你原来的立基结合在一起，所以 2014 年察哈尔学会把和平学作为一个综合的领域，我们把和平学和公共外交结合在一起，我们做的公共外交就是以人类和平为目的的公共外交，而不仅是局限于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我们要做公共外交的内容也是以中国的和平为内容的一些公共外交。所以，一个民间智库，资源少、规模小的智库，就是要专注、专门、专心。

王辉耀：谢谢柯银斌先生阐释了你们对公共外交的理解和你们的一些经验。你刚才讲你们的智库很独立，但是你们智库的主席也是政协外事委员会的主任，也是来自于政府。

下面再问一下周先生，刚才布鲁金斯提到影响力，实际上在智库时代如何发挥影响力？您在传媒行业有很深的经验，那么智库如何发出它的声音？在中国这个多元智库的时代到来的时候，如何通过传播或者品牌来打造智库的影响力？包括它的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舆论影响力，你这方面可能有很多体会。

周志兴：我想，中国发展到了现在，这么多事情需要管理，就像李成刚才讲，戴高乐说有 247 种奶酪的国家怎么个管法？我在想，像中国这样有数不清的食品添加剂的国家，不是更难管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好的智库来给国家出主意。过去我们国家的主意都是在社科院这个层面就出了，其实社科院就是出主意，领导自己都有主意，现在很多智库就是给领导的指示来做诠释，比如领导说要搞四个全面了，然后就写我们怎么样落实这四个全面。真的智库不应该是这样，而是应该真正想出解决这无数种添加剂的办法来，这点上来说，我为我们的智库有这样几个关键点。独立性当然不用说了，但是独立性由什么来构成？首先是资金，李成最头疼的就是资金，如果说资金问题解决不了，李成就要被炒鱿鱼，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可怜他。我觉得资金的独立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企业家现在还没有捐钱给智库这种习惯，就算是有个别的捐了钱的，可能也要有制约，比如你要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应该是不受这些私人捐款的影响。第二，智库要有专业，没



有专业肯定不行，就是刚才柯银斌讲的要认准一个方向，布鲁金斯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智库，但是在咱们接触的还是中美关系、地缘政治方面接触得多一些。但是我认为，智库应该有自己的专长。第三，配合专长，应该有自己的专业人员，就是要有领军人物，就是今天傅莹讲的，每一个行业的领军人物在这里。第四，要有前瞻性，咱们的智库不能光顾眼前，不能只是领导说什么了我们就来解释什么，而是要看到两年以后、三年以后甚至十年以后，可能要有不同的梯次来研究将来的问题。第五，咱们的智库要有品牌，布鲁金斯如果是个品牌的话，我觉得察哈尔也是个品牌，现在公共外交的品牌，当然李成没那么独立，你刚才说自己完全独立我也不承认，但是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第六，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就是要有自己的影响力出来。咱们的智库的成果应该分成两种，一种是面向社会大众的，这应该是有影响力的，一种是中国人喜欢的递折子，这可能不是影响力，可能是在领导那儿有影响力，但是总而言之是一个影响力的问题。

当然现在有很多问题，首先是独立性的问题，因为资金问题解决不了，限制比较多，所以独立性解决不了。第二，咱们没有一个这样的渠道，就是咱们的官员真正下来作民间智库的研究人员，咱们现在所谓官员下来做的民间智库基本上都是官方的智库，我不知道魏建国部长来了没有，都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去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毅宁（音）领着我，推开一个门，这是前财长到咱们这儿来了，又推开一个办公室，这是前前财长到咱们这儿来了。咱们没有这一说，当然，根据中国这种官场的习惯，一个部级官员到了咱们这样的民间智库可能会不习惯。第四，有些敏感问题还不敢涉及。

王辉耀：您讲得很好，在智库的影响力方面，包括它的社会影响力、媒体影响力方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智库是通过它的社会影响力来形成社会共识，倒推社会影响力，说到底还是政策影响力，当然建立共识、社会影响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咱们解剖了三个智库的案例，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都是非常有启发的。我个人认为，中国智库虽说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是也还要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个，现在一窝蜂而上，有的咨询公司也跟智库靠边，也说自己是智库，这样会把智库的品牌做坏了，还是要跟公共政策有关的非营利组织是最重要的智库，影响社会大众，同时是非营利的，如果它要想营利，那你就是麦肯锡，是咨询公司，不能称之为智库。所以在目前中国这个概念比较混乱的情况下，需要我们作更清楚的澄清。

第二，智库实际上是需要人才的，特别是中国的智库现在在建设时期，我们特别需要智库人才，特别是缺乏领军人，像胡鞍钢的公管学院，带起了国情研究所，领军人才对智库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也赞同智库的建设最后是靠人才来实现，包括中国开放旋转门，允许退下来的官员到各类智库包括到民间智库去兼职，我觉得以后肯定会有这一步，我希望这方面能得到发展。包括我们的智库，龙永图是我们的智库主席，像吴建民大使都是我们的顾问，这也可以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智库的建设。

第三，很重要的，智库要形成和社会、和中国企业界互动的文化。现在智库好像和社会、和企业比较脱离，实际上我们也需要企业的非限制性捐助来扶持中国智库的成长，如果没有中国企业家起来，或者就像国外的基金会、企业家的捐助，智库也走不了太远，因为说到底智库也是智力密集型很高、费用很高的行业，需要社会的捐助和企业家的支持，而且是不带限定性的支持。中国的智库应该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目前决策特别需要更多智库参与的情况下，智库也是加强基层民主、科学民主决策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最后我把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在座的听众来提问。

听众提问：我来自新华社瞭望智库，我作为智库研究的记者已经干了三年，专盯国内外大小智库的动态，这是我们新华社的一个很新的业务。我有一个问题请问李成老师，人才的重要性，领军人物的重要性。我记得十天之前有一篇文章非常火，题目是“中国知华派专家”，李成先生榜上有名，而且排名靠前。我想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知美派、知日派、知英派这些外交政策的领军人物在国外的发展以及他对中国智库建设的意义？我个人感觉，这可能在未来是中国智库发展比较有意思的新兴趋势，我们是不是要打造这样一些知日派、



知华派、知美派的明星？这可能是智库发展中的必然趋势，您取得二者的必然逻辑是怎样的？

李成：首先我要讲外交学院的这个评比也是尝试的，不一定有完全的科学性，不管怎么样，很高兴我们被选上，在前十位当中有五位都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在美国十大知华派里有五个都是布鲁金斯学会常驻研究员，这本身也反映出布鲁金斯学会的实力。

但是这个问题在于中国实际上有非常好的一流学者，包括胡鞍钢老师和在座的很多，布鲁金斯学会在过去几年当中也出了《中国思想家》丛书，我们准备有 12 个思想家，各个领域选一个，包括政治学的俞可平，法学，人口和经济学的胡鞍钢，我最近在编何华宁（音）教授的伦理研究，还会做青年研究、女性研究、宗教研究，希望把中国最好的学者介绍到西方去，因为这是不对称的，你到中国的书店可以看到很多西方学者的书翻译成中文，但是到你到美国的书店去看，有多少中国学者的著作能够在美国书店的书架上？几乎是零，这是很不对称的，这对美国等国家是种损失。假以时日，中国的思想家会走向全球，但是这需要一个宽松的、开放的学术环境，这很重要，尽管我刚才讲了，追求独立也许不是目前中国智库发展的重点，但是有一个学习的氛围，有一个开放的氛围，有一个多元的环境，这会帮助中国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而目前这种情况，中国对外交流的方式、中国智库的声誉还处在低潮期，这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智库发展不是搞公关、不是搞宣传，更多的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文化的对话，我们不能夸大了文化上的不同点，在有些方面中国当然有它的特色，但是如果过度强调特色以后，你就会限制自己，所以为什么中国的许多学者本来应该有世界知名度但是没有实现，有很多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氛围，当然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但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尤其是中国对思想库建设的重视，不断地会有新一轮的年轻思想家或者是世界性的思想家诞生。

听众发言：我是外交学院的博士生刘畅，刚才新华社的这位听众提到的外交学院的报告就是我的老师带领主持的，我作为课题组的其中一员全程参与了整个活动，这个报告的



研究是外交学院副院长主持的。我的问题是，我们做这个报告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搞一个排序，科学性可能是有一定问题的，我们是在做一个尝试，但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其实是探讨一个如何让美国的专家更了解中国人怎么想的途径，以及把更多的美国研究中国的人介绍到中国，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当然像李老师、李侃如先生这些大家不用说了，一些新生代的中青年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是怎样的，我们希望引入到中国来。根本的目的是寻求中美两国之间拒同化异的渠道。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智库合作和智库交流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知识界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做这个研究的根本目的，请问李教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智库合作如何能够在制度性上面有一个创新性的探索，使得中国和美国之间智库层面来带动整个两个国家社会之间、民众之间的互相认识，能够创造一个有利于中美两国和平稳定发展的支持性、建设性的氛围？

李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答案应该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开放和交流。我自己和刘亚伟的中心本身就是开流的受益者。开放和交流在布鲁金斯也很明显，中国外交政策当中有一大批人都是在布鲁金斯曾经作过访问学者，包括王莉丽、王辉耀，都在布鲁金斯待过很长时间，包括很多中国研究外交的学者。但是你会看到，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研究中国的人能够到中国智库待过很长时间，能够成为美国的思想界、外交界有影响的人是很少的，很不对称，我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方面也是很开放的，只有你开放了，包括你到智库来访问，你可以看到智库的很多弊端和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你就会知道并不存在什么阴谋论，像布鲁金斯这种跟政府关系很密切的，更多的是一种善意的批评和良好的愿望。对我来讲，我本身进入智库也是八九年之前，这以前我也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到了智库以后才发现这种想法有多可笑。这种开放可以帮助两国改善关系。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是要加强智库的开放和合作，用战略的角度来讲，能够形成互信，本身智库就会带来很多朋友，而这种朋友带来的影响，它影响民众、影响政治、影响决策，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尤其我们看到未来一代，我们智库里有很多中国学生，他们回去以后会知道华盛顿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希望我们更有机会来提供这样的条件。但是遗憾的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赞助来支持交



流，美国考虑的更多的是财政来源的安全，中国更多的是其他的考虑，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需要两国维持和加强这样的交流。

听众提问：我是来自澎湃新闻的记者。

这个问题给在座的各位老师，这个环节大家谈到智库要多元化发展，同时也谈到中国的智库迎来了春天，但是也有这样的观点，已经有人谈到中国的智库是不是有大跃进的迹象，希望各位老师谈一谈如何既要发展又避免出现像早年“大炼钢铁”的情况？

王辉耀：我希望不是把中国所有的咨询公司都定位为智库，其实智库更多的还是跟公共政策有关，而且是非营利的。

柯银斌：一个是功能定位大家不一样，在实现同一个功能里，大家的战略也不一样，在战略定位同样的情况下，大家在战略里的领域不一样，在同一个领域里的方法方式也有不一样的，如果这三个层次的不一样加在一起，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功能定位、领域定位、方式定位，三个定位都很清晰，大家都不一样，是个生态系统。

周志兴：你说的情况一定会出现，就会大跃进式地涌现，但是这句话你不要作为新闻的标题。为什么呢？我们国家历来都是这样，只要是最高领导有提倡，下面就会一窝蜂地上。我觉得也没什么可怕，就是可以慢慢调整，在实践的过程中，有的可能就被淘汰了，有的就被消化掉了，最后剩下的是好的，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出现，就是浪费了钱、浪费了时间，但是我想，一个好的智库成熟，可能需要这一步，如果现在就采取国家调控的办法，符合什么条件才能办，你这个可以办，那个不可以办，也可能把好的东西扼杀掉了，如果在市场竞争中有好的东西出现，那可能比行政手段要好得多。



李成：我觉得中国智库的发展目前最忌讳的是雷同，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也同意大浪淘沙必定会把很多东西淘汰掉，这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包括美国等很多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这引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处理好人才的竞争和智库本身的建设？布鲁金斯学会本身有 100 年的历史，人才可以走动，最终是一个布鲁金斯的品牌创造出来了，所以两者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小的智库也许会做得很成功，智库不仅是与个人相关，如果想要长久发展，要有个性，这取决于智库本身的建设，这方面，不光是大而全还是小而精，这是不同的模式，我们布鲁金斯走的是大的模式，但是并不是大的模式都可以这样做。而且实际上我知道，社科院也在创建新的智库，有七个新的智库成立了，习近平提倡建设新型智库，他们的调整也非常快，这方面会有很多新的变化，这是好的事情，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应该批评过多，因为这是早期必然出现的现象。

王辉耀：这场三位专家跟我们分享了非常精彩的观点，我得到的关键词，包括智库的多元化，如何打造中国的思想市场，如何建设中国最好的智库和发掘智库的人才、提升智库的管理，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再次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

智库的国际合作：中国智库如何走向国际化？

齐晔：谢谢大家，今天下午是非常精彩的下午，最后这一个部分是来讨论智库的全球化国际合作，国外智库和中国智库合作的问题。不作特别多的介绍，直奔主题。

首先从 Joan Kaufman 开始，您有很多工作的职责，在联合国，在美国工作，现在在中国是哥伦比亚全球中心的亚太主任，在这之前您是在肯尼迪大学工作过，同时也在布兰代斯（音）大学开设了全球健康政策课程。您对美国、中国的政府和学术界的工作都非常了



解，我的问题比较直接，为什么要走向国际化呢？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使智库要走向国际化呢？也许您可以给我们举一些例子，比如为什么哥伦比亚要走向国际化，要建立这样一个全球中心？

**Joan Kaufman:** 我加入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的网络是因为我非常喜欢他们的理念，哥伦比亚大学的领导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我们需要去教育我们下一代关于这个世界连接的必要性，我们也要解决一些世界问题，这些问题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影响，比如 SARS。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形成一个全球知识的社区？哥伦比亚大学在全世界不同地区设有八个全球中心，我们在这些地区和当地的社区一起，让他们从社区的角度去了解全球的问题，这是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大家在一起就像一个网络，和哥伦比亚不同的部系一起合作，这就是我们的智库、我们的学术界、我们的政策和研究机构，我们一起了解从全球的角度碰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不是说走向国际化，我们现在就是国际化，中国也是越来越国际化，中国现在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不光是“一路一带”，还有其他很多影响，比如关于水坝的项目、河流的项目给亚洲其他地区带来的影响，还有其他的决策对全球的影响。

齐晔：我从另外一个角度问一下，您觉得您的主要客户是谁？

**Joan Kaufman:**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的客户是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它不光是一个中心，我们希望能够带来全球的讨论，讨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希望能够让相关利益方也能参与其中。不同的问题会有不同的相关利益方，比如全球社区、环境的推广，我们希望能够有非常广泛的对话，有时候会有决策者的参与，比如讨论环境问题，哥伦比亚大学在环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如何让在这儿的的相关利益方能够参与到。因此我们的客户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的客户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以后能够制定一些影响全球的政策，这些政策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了影响。



齐晔：夏宇先生来自于新华社，我们知道，新华社，特别是新华社的瞭望智库在中国的智库建设中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而且您是在瞭望智库作主编，同时又是《财经国家周刊》副总编，我们也知道，您过去在地方新华社分社，在广东、在平壤也工作过，所以既有全球视野也有地方视野，同时您在做瞭望智库，瞭望的地方也比较远、比较广。从您瞭望的范围来看，中国的智库目前在全球化也好、国际合作也好这方面，请您给个简短的评价，您认为问题在哪儿？

夏宇：我首先解释一下瞭望智库。瞭望智库是新华社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精神建立的一个智库，时间并不长，去年成立。因为中共中央要加强新型智库建设，我们是参与了其中的决策讨论，并提了一些建议，因为去年7月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中国新型智库应该怎么弄的任务，我们也举办过相应的活动，做过相应的调研。我们这个智库的基干是放在瞭望周刊社，瞭望周刊社有瞭望、环球、财经国家周刊、瞭望东方、国家城市评论，我们是一个集群，因为我们有研究的传统和基因，所以就把智库的职能和建设放在了瞭望周刊社，我们也叫瞭望智库，同时也承担瞭望整个集群的媒体转型任务。

至于您提到的国际化问题，实际上，一提到国际化问题我就想到毛主席说的一句话，“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要让全球听到我们的声音”，这是1965年主席给我们新华社提出的要求。现在以新华社瞭望智库为代表一些新的智库出来，对于国际化或者全球化、国际合作这方面的现状的评价，我觉得现在是势头很猛，但是在深度和广度上还远远不够，这是一个总体的评价。

对于国际化，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的要求，一个是视野上和心胸必须是国际化、全球化视野，因为中国问题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解决好中国问题必须解决好世界的问题，这也是毛主席在1921年开会的时候说的一句话。我在谈历史，因为新华社是一个老的机构，81年历史，从红中社开始，从苏区开始，所以在这块必须把全世界关心的、紧迫的问题，特



别是与中国有关的问题纳入智库研究的范围，否则的话，我们的研究就会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小，实际上你跟别人没有共同语言，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要有全球化的目标。因为对于国际化，中共中央颁布的文件我们提前四个月就拿到了，去年年底我们就看到了最后的文，这个文里的第 17 条是关于整个国际化建设的完整的阐述，即必须加强国际传播链建设，话语体系建设，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这是提出的四个目标。因为我们瞭望智库是个媒体型智库，我们也定位于自己是一个智库型的媒体，我们在国际化方面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的道路、中国的制度、中国的政策做好战略传播，说白了，第一，要让别人听得见；第二，让别人听得懂；第三，让别人记得住，这是我们的目标

最后是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运行机制能够和全球接轨，包括你走出去、请进来，包括你的相应考核体制，资金募集的好方法，你必须要跟国际接轨，让别人能听得懂，而且你的资金来源也可以是国际化的。

齐晔：我还有个跟进的问题，你们是一个新闻社在干智库，必然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劣势，能否给我们说几条新华社办这个智库的优势、劣势表现在什么地方？另外，放眼全球，您觉得哪一家智库最像你们这种性质？

夏宇：第一个问题，媒体型智库，特别是像新华社这样一个机构来办智库，有它的基因，它有深厚的基因。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调查研究是我们新华社的看家本事，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产品、我们的风格，我们强调到一线调查，我们是一定要到一线去，我们一定要和核心人物展开核心交流，这是我们做研究的最大特点。第二，从我一参加工作开始，可以说李侃如先生通过新华社 2010 年到 2012 年报送的所有材料是通过我签发出来的，因为那时候我正好管北美这一块。因为新华社有自己的渠道，就像李扬院长讲的，社科院有很多自己内部的刊物影响决策层，新华社也是一样的，而且新华社对中央决策的影响，无论从数量还是时间，或者说在客户的信赖度而言，在党政机关里可以排得上前五



没有问题的，每年我们要报大几千件调查研究报告供中央进行决策，这是我们的优势，中央领导信赖我，而且新华社的报告有一个特点是写得比较好看，不像党政机关的或者像研究机构的是很完美、很有体系的，读起来很有节奏感，但是新华社的更多的是一个一个的故事，是靠这样的东西去打动领导，领导每年给我们的批示和反馈是很多很多的。

但是我们的劣势在哪儿呢？因为我们筹办将近两年的时间，整个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一个是我们的专业度不够，因为你参与调查，我再引用毛主席说的一句话，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实际上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我作为在新华社工作了 20 年的人，我有一种感觉，相应的，我们在很多领域是靠记者的一种观察，但是你取代不了专家，这是我们的最大的问题。还有是在人才建设上，因为记者和研究者是不一样的，记者可以说是杂食动物，什么都关注，但是作为研究者，他是长期、长年关注一个领域。举例来说，我们写出来的报告，中央领导有反馈了，而且是正向的反馈，但是我们和相关部委交流的时候，别人不以为然，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智库，就是要真正地做到专业化，把我们记者新闻调研的缺点克服掉。

齐晔：您的答案中说的几点都非常重要，一个是调查研究，一个是渠道很重要，你得顶天，还有是呈现的方式，这对我们大家都是很有启发的。

下一个问题提给姜春力先生，您是来自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外国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CCIEE，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超级智库”，2009 年开始，国经中心组织了第一次全球智库峰会，每两年一次，今年应该是第四次全球智库峰会了。你们在组织每一届峰会的时候都应该有很多收获，因为姜春力先生是来自于国经中新信息部，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姜春力：首先感谢主持人刚才对国经中心的介绍，在座的搞智库研究的同志，像胡鞍钢老师、王莉丽、李成先生等，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可能都比较了解，但是不搞智库研究的人，可能对我们中心了解得不太多，所以我先介绍一下国经中心的情况。



国经中心成立于 2009 年 3 月，成立的一个初衷就是在中国在快速经济发展 20 多年的期间发现和 国际交流缺少一个民间的对话智库机构和国际上的智库进行交流，一般都是政府出面，政府出面就比较被动，你说出话来就得代表政府立场，你说话就得算数，缺少一个软的机构，咱们可以讨论交流。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当时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的一些研究部门的几位专家和领导提出来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这么一个机构，提了这么一个创意。当时提出以后，一些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就沟通发起搞了这个智库，所以 2009 年 3 月 20 号成立，当时媒体报道，一看阵容，基本上把中国国内的学者、专家、企业家和政府里做研究的专家型政府官员都囊括在内了，我还记得 2009 年 3 月 21 号的媒体报道说是一个超级豪华的阵容，任何一个成员拉出来都是媒体追逐的明星。当时成立时候的定位目标，一个是进行研究，站在中国的立场，从国际的视角来研究问题，所以从我们的名字大家可以看到，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实际上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问题。第二个定位就是交流，我们得有一个从各个领域能和国际对话的研究机构，所以第二个定位就是和国际智库进行交流，我们和彼得森的交流最多，因为我们每年有两次中美高级领袖和 前高官对话。第三个是咨询，刚才很多人都讲智库的独立性和智库的资金来源，我们真是一个独立的智库，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没有财政经费，可能有很多人理解，但是我们从一成立的时候就是一个民间社团组织，在民政部注册的，没有财政部的拨款。刚才可能有人问李扬院长，说你们社科院由财政拨款，你们怎么保持独立性？这对我们不是问题，我们没有财政拨款，所以我们的第三个定位是咨询，就是为国内政府和国外政府提供咨询服务，通过这个咨询服务取得收入来维持我们的运营。所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三大职能就是研究、交流和咨询。

关于主持人问的问题，我们已经连续办了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今年 6 月 27、28 号还将举行第四届智库峰会。我是从第一届峰会就参加，因为从创办国经中心我就参加了，2008 年的时候我就参加了。四届峰会办下来我有这样一些感受，第一，全球智库峰会的举办对中国智库走向国际、和国际交流开创了新的天地。因为在这之前，大家一般用“智库”这个词比较少，用“思想库”、“智囊团”、“研究机构”比较多，但是第一届峰会之后，



媒体用的词一般都是“智库”了，统一了。同时，中国智库也是第一次和国际智库在同一个平台上讨论问题、进行交流。而且第一届智库峰会基辛格先生参加了，他当时在会上自问自答说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全球智库峰会是你们中国人想出来的，美国华盛顿一条街上全是智库，大家为什么没有提出来我们应该组织这么个会议？因为2008年是国际金融危机，那时候正好大家都面临很困难的局面，我们为什么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呢？我们是不是开这样一个会？更没想到全球开一个，你们中国人想到这个办法出来。同时他又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所以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全球智库峰会为中国智库和国际交流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开创了一个非常好的先河。

第二，全球智库峰会也引起了中国对智库作用的重视。不管是习主席还是李总理，到各国访问，一说国际合作交流，总有一条是智库合作，这说明越来越重视智库的作用，这也为中国智库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特别是今年1月两办发文，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设的目标、要求，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特别刚才有人问今年会不会出现中国智库大跃进，有可能，因为今年确实是中国智库发展重要的一年。

第三，社会公众也越来越关注智库的声音。在以前，智库只是作为政府政策的一个解读者，社会公众特别是媒体对智库往往是认为它是政府的一个附庸，但是现在只要是政府出台一些政策，往往先是智库在讨论，不管行不行，反正大家先讨论。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中国老百姓谈到延迟退休的问题，前两年可能老百姓一谈这个问题反对就比较多，政府也在研究，因为这里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由智库、由研究的专家学者提出这个问题，今年两会的时候，人社部的部长尹蔚民也谈到延迟退休的问题，但是你看到社会的反应很平静了，只是说延迟退休的必要性肯定是有了，但是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不像刚开始一听说延迟退休都说为什么要延迟退休？以前都是60岁就退休，现在要延迟到65岁，凭什么？现在大家接受这个观点了，所以社会公众对智库发出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关注了，同时和政府的决策也互相配合起来了。

齐晔：刚才夏宇先生说了，李侃如是他的老师，大家也确实都这么称呼，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会议，每一个人在发言的时候都在说我是读着李凯如的书长大的，他也是非常受人尊重的，在密歇根大学教了36年的书，现在有一个研究中心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主



要由于他对中国研究的贡献。我们确实从您这边获得了很多知识，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获得您个人的建议。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感到很疑惑，去年我非常荣幸成为了布鲁金斯清华中心的主任，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机构，我的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智库，我见到他们就想跟他们去解释，他们总会问我一个问题，现在我解释得已经有点疲倦了，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总是愿意花钱帮助中国政府制定政策呢？他们是想去影响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吗？还是想收集信息、收集数据，使自己更好地制定政策？我在能源基金会做的时候，他们的资金更充裕一些，他们主要是研究能源效率的问题，我当时也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但是现在我遇到这个问题越来越多了，所以想问一下您的意见，我该如何给我这些朋友去解释这个问题？

**Kenneth Lieberthal:** 首先我想说，我很高兴你接受了这样一个工作，在您的指导下，这个中心也做得非常好。今天大家都说到了很多关于布鲁金斯学会，我也不想再多说了，因为每个讨论可能都提到了。我专门说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它可能涉及到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傅莹大使刚才也提到。

中美都希望能够获得关于公共政策的好的建议，能够给两国政府，在外事政策方面，不只需要你了解外国政策的政策是怎样的，还有影响的因素是什么、它的地位是什么。这九年来我也是跟中美两国很多人在聊，我们很多时候都使用同样的词汇，但是可能理解上差别很大。每一方并不了解对方的政策系统，包括政策制定的系统，也就是什么是更可行的，什么是做起来比较困难的，以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很少有人了解彼此的社会和文化，或者说了解对方的现代历史。如果说你想做到有效率，一种有建设性的合作，并且最大限度地减少误解，必须找到对对方的体系有足够的了解的人，知道他们的顾虑是什么，他们用这个词说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再把它转化并给到你们的建议专家，对于两个社会、两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走向国际化，就是要培养这种有充足知识的人，而且能够转化这种话语。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中国政府的政策质量呢？因为中国的政策我们有直接的兴趣，也有间接的，不光是气候变化、能源安全这样的国际化议题，其实所有的议题都是与我们相关的，所以我们肯定希望中国能够做出高质量的决策。我们也希望了解为什么中国是这样的一种观点，以及中国是否了解我们美国是怎样的一种观点，有很多时候会有误解，如果有误解，自然就不会产生互信。我们可能不能完全消除，但是智库能够发挥政府发挥不了的作用，智库能够更好地去了解这些想法、对方的假设条件是怎样的，也能够以一种与政府官员相区别的方式去做对话和联合研究项目，这也是一种沟通和交流的方式，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效的。政府之间的对话是比较浅的，有些时候你也没法去说更广泛的议题和更广泛的可能，但是智库就不是如此，首先有像布鲁金斯—清华这样的机构，这是第一步，是非常好的，我们也还有其他的中心，比如在多哈和德里都有这种中心，我们觉得这种互动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把学者的知识拿到一起，然后去给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还有一点重要的就是你要真正理解彼此说的这个词、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而这个需要大量的工作，我们读到的这种文件可能翻译成了英文，我们能够正确理解这个词在中国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如果你去读中文，会发现有一些隐含的东西、一些微妙的东西没有翻译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对政府官员也有一些限制，比如在某些场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所以我觉得，政府官员作为学者，作为智库的从业人员，在公共政策当中，智库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也非常高兴地看到智库在中国不断地快速发展，并且呈现一种多元化的智库发展，这对于中国来说是走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齐晔：关于沟通之间的差距，有些人可能会说在某些方面更适合国际化的智库，比如你能够找到共同利益点的，像气候变化、能源、全球治理这些话题，这些话题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智库研究的。你是否发现有一些关键的领域是智库应该特别特别关注的？

Kenneth Lieberthal：我觉得有很多领域，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是气候变化这个议题，这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还有有一些学术方面的议题，



比如关注公众健康。我觉得不是某一个领域就特别关键，其实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如果你看一下这些跨国企业，你会看到所有的跨国企业不光是走国际化路线，他们也在全球做调研，他们会在世界各地有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不断地进行沟通、交流，他们会对某些问题进行联合研究，在各个中心之间以合作的方式来做。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因为这是一个找到答案的非常好的方法，而且在不同的市场都可以。我们也要知道他们了解到的一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希望能够将他们做的事情提高效率，因为他们要在全球去开展他们的业务。

齐晔：确实，我们有着智库走向国际化的需求。

下面请听众提问。

听众提问：李教授，非常感谢您的精彩演讲。我的问题是您有没有做过关于犹太人的研究，比如特别不同的国度的犹太人。因为在美国，特别是您的国家，比如道琼斯、纳斯达克等等。另外，以色列会是这样的情况？首先是他们在金融方面、法律服务方面，他们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知名。在中国，为什么我们丢失了很多资金？我们的法律服务体系怎样？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服务，我们的智库、我们的国家公司、私营部门等等，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是没有办法的。

齐晔：谢谢您，我相信您是问了一个问题，也许我们再问几个问题，然后再回答。

听众提问：我是香港中评社记者，我有一个问题提给 Kenneth Lieberthal 先生。一提到中美关系，现在经常说的词就是中美两国要相互理解、尊重，所以我想问，中国和美国的智库应该通过怎样更加具体的方式在中美两国遇到问题或者冲突的时候能够彼此更加互相理解或尊重？



听众提问：我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博士生陈静，我的问题是，我现在的感觉是沟通和交流非常关键，请问夏宇先生，在您的工作具体实施过程中，怎么样让中国声音被听到，并且被听懂？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说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有时候会给别人有一种误解。

同时我的问题也想问 Kenneth Lieberthal，从您的角度，您能给我们中国的学者或者中国的从业人员什么建议，就是让我们中国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并且被理解。

听众提问：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刘延玲，现在美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存在政治极化现象，它有很多原因。我的问题是，您认为美国的智库在美国当下政治集化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Kenneth Lieberthal：** 谢谢大家的问题。

首先，比如美国和中国之间如果有一些冲突，那么智库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去解决这些冲突？通常我们叫做闭门圆桌会议、闭门圆桌讨论，讨论的内容都不是公开的，我们有中国的一些客人，比如我们在双方关系上有严重问题的时候，一个情况就是有中国的代表来到布鲁金斯学院，还有布鲁金斯学院的人和华盛顿的智库的一些人，我们会有闭门讨论，他们会非常严肃地讨论我们的意愿是什么，美国是怎样看待的，美国的官员是如何去看待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些警报是什么，或者是提醒了我们什么，这个红线在哪里。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了相同的事情，我们大家个人的关系都非常好，我们可以同美国政府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能够跟政府进行恰当的交流，政府决定他们自己的政策，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替他们制定政策，但是我们可以跟他们在恰当的时间进行沟通。

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我们有一个项目，每一年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学者，这位中国的年轻学者六个月在 BTC，六个月的时间在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目的就是这位学者可以了解另外一个国家的环境。大家要记得，这些是年轻的学者，每一个年轻的学者都可以去了解一个公共政策的智库是怎么样开始工作的，他们要知道智库的



影响是什么，在政策方面如何进行沟通。我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形成一群人，他们能够深入地了解双方的情况。

今天下午我们一直在说各个方面的需求，说到中国的声音如何在美国被听到、被大家理解，夏宇和李成也说到这方面的话题。

夏宇：在对外传播方面，上一轮的主持人提的一个问题我想要回答，就是国外有没有传播型或者媒体型的例子，有的，《经济学人》，它自己认为它是张报纸，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智库，它做的很多产品是面向市场化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至于中国的声音如何被别人听得到、听得懂？我个人作为中国的媒体人员还是比较惭愧的，因为这确实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否则的话，我们相关的主管部门不会提出外圈战略，设立外圈基金，这至少是说明你的工作不是像预想得那么好。这里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比如要你的声音被别人听到，这里有一个先分类再排序的问题，因为有一类声音，你说的别人也是不想听的，比如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特别是关于我们社会制度的问题，你说得再多，别人的既定意识已经形成了，这是很难很难改变的。像前段时间总理接受 FT 的访问，其实 FT 在报道中国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上，在我看来是比较明显地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既有观念的，比如有一个词，他说到中国的人大的时候，一定是要前面加一个词，叫“橡皮图章”，中国的橡皮图章怎么怎么样，这就是一个偏见，但是这种偏见靠我们说是不是能真的改变它呢？我看了这么多年，自己也做了这么多，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要靠我们努力，但是很难做到。但是有些是可以的，是有可以提升的空间的，比如我们中国正在做的事情，这里有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你自己是否能把相应的翻译做好，最简单的，像傅莹大使说的，“四个全面”你怎么翻呢？因为这是中国语境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让英语世界或者其他文化地区的人真正明白这个事，这种事情真的需要耐心。我要引用前总编辑南正中（音）有一句话，他说中国有一句俗语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不要这样，是当别人很难在短期内突破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接受这样的现状，但是你可以在



你能做的领域、能做得好的领域花点功夫把它做好，这方面有很多很多例子，尤其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我们要借助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比如我们的智库研究，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比如我们的研究能不能搞众筹？现在包括美国的智库模式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几个专家在一起聊，我们一起研究，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把一个话题放出去，放到网上去，我们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参与，说不定用这种互联网的思维就能颠覆掉原来我们克服不了的传播上的障碍。

齐晔：智库也进入了“互联网+”的阶段了。

听众提问：我是来自安平基金的，请问夏先生，您说你们智库现在遇到的问题，第一是记者专业性不够，第二是记者的思路太宽泛。请问你们智库在发展过程中怎么保证研究关注点的一致性和研究尽量专业性？

听众提问：我是来自磐石环境与能源研究所的姜超，我们是一家民间研究机构，我们也自己定位为民间环保智库。今天有好多嘉宾都谈到了“独立性”这个词，在纠结很多机构可能面临独立的问题，作为一家草根智库，可能我们拥有更多的独立性，但是我们缺少了去影响政策决策者的途径。我的问题是请问李老师，对于我们这种草根式的智库组织，如何去提高我们的影响力？有没有什么建议？作为美国的智库组织，有没有考虑过跟中国的草根组织合作？

听众提问：我是东方早报澎湃新闻的记者，我的问题请问夏宇先生，您刚才提到了媒体办智库的例子，就是《经济学人》，我也多次跟他们有过接触，据我了解，他们的媒体部分和研究部分是完全分离的，互相有借鉴。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这边，包括瞭望和世纪研究中心，它是怎么个情况？和《经济学人》相比有没有自己的不足或者是有自己更优势的部分？



**Kenneth Lieberthal:** 谢谢您的问题。实际上美国和中国有很大的区别，从我的观点来看，一个国家有重大的环境问题，它从根本上去改善了他们的环境表现，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民间环境运动，这个运动能够带来政治影响，绿色非政府运动非常关键，我相信每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在之前都有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但是他们都大大地改善了这个问题。中国的高层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这是值得我们表扬的。而且中国现在允许草根机构能够去汇集一些信息，还有一些网站能够去收集这些信息，去了解地区的环境问题，这是非常好的。对于这个问题带来的政治影响，这还是比较敏感的，我不知道这个界限是如何随着时间去演变的，我相信每一个大的工业化国家，从基础上来说，比如一些化石能源行业，这些行业其实非常强有力，因为我们很多的发展都是基于这些化石能源，要改变这种现状是非常难的，它不仅要求高层领导的激励，还需要其他的一些领域，需要我们民间或基层的带来的一些压力。我不知道这个随着时间如何发展，因为我们一方面要保持稳定性，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努力，从民间组织的能力和知识方面去受益，去做出这样的影响。

**夏宇:** 刚才李老师的问题，我们瞭望智库可以帮忙，您自己定位为草根智库，我不这么看，因为实际上没有什么草根不草根，它的思想和方案是没有等级观念的，我们瞭望智库是开放的，您这边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方式，可以通过我们的渠道，一是传播，二是可以传达给我们的领导层，当然前提条件它是扎实的，是有调查研究基础的。

关于记者怎么保持专业性，这也要一分为二地看。新华社或瞭望智库想做的调研在某些领域是专业的，是有它的优势的，比如在传统的政治领域、在民族宗教领域，因为新华社在调查上有它自己的优势，它比较容易接近一些信息源，比如一些重大突发事件或者重要的热点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接触到真相，因为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这方面的优势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另一方面的不专业性表现在和布鲁金斯和这样一些大的智库比起来，在经济研究上，特别是专业领域，比如金融，特别是在互联网背景下社会变化、社



会治理的问题，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因为我们在一些热点事件的调研中，和相关部委交流的时候，他们经常有一些苦恼，比如像阿里这样的电商的很多问题，像税收，怎么收？这是以前没有的业态。特别是像滴滴打车，怎么管？美国也是一样的，当然美国的市场宽容度很大，但是中国原有的治理体系是条条块块下来的，是不是能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问题？这是越来越多的问题，新华社和瞭望智库的记者想做这些调研的话，一是让记者专业化，二是要开门搞研究，就是一定要跟各个方面的学者形成好的机制，因为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中国其实不缺聪明人，也不缺方法、不缺渠道，但是就是怎么在合适的时间，正好在领导视野在那儿的时候，在这壶水要开的时候，你能把东西拿出来，这就是整个架构设计的问题，这块我们也在做探索。

关于《经济学人》的这套机制我们是怎么学习的，说实在的，我们在很初级的阶段，我们还在刚刚摆脱了概念理解，进入实操的阶段，这实际上涉及到媒体转型的问题，媒体转型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一个人的工作习惯问题，你整个考核机制的问题，他原来是记者，你现在让他做研究，你怎么考核？他的生活习惯、工作习惯，整个一套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到底是盘活存量还是做增量？是重新另建炉灶？我们在办智库的时候碰到了很多这样很纠结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在我们这块做研究和传播，我们没有那么明显的分界，实际上我们的记者每个人有他的个性，有的是研究比较强，他可能会偏向研究，但是在瞭望智库的情况下，他有时候也做一些报道。具体到中国舆论的生态，它是这样的，你完全照搬先进的生产方式，到中国来，它不一定能够完全适应，我们现在就是在探索当中，这里有很多很多纠结之处，我们可以再交流。

**Joan Kaufman:** 我不想花太多时间，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讨论中有一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你看看中国的智库在全球的足迹和角色。我也同意刚才的专家所提到的，从全球的非政府组织发出的声音来推动一些内容，特别是和政策相关的，这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环境问题就是很明确的一点，还有一些其他的领域，像医疗、健康等等，有时候这也会改变政府的一些观点，并且再反推到行业当中，比如全球健康的问题。



中国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有封闭的系统，现在我们看到有多元化的智库能够为政府的政策提供建议，民间社会的声音也应该是被听到的，比如关于环境的问题，其实也有很多研究机构现在正在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政策建议，比如关于环境上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组织机构现在也在这个领域中涌现出来，不光是一些政府支持的下属的机构，他们都在做着自己的贡献，所以我觉得这个范围也在不断拓展。这种知识的生成以及能够融入到政府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你看美国的智库，他们有不同来源的知识和不同角色的人发出声音，把这些都纳入到一起是非常关键的。

互联网的治理在全球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很多讨论，包括互联网主权以及如何自由地获得全球的信息。因为现在我们是一个知识推动的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知识来源，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能够把它放到一个全球的议题当中，让这些智库考虑到如何更好地获得这种信息。这种信息的对称性能够影响很多东西，包括全球贸易等等这些全球议题。

谢谢。

姜春力：我简单说几点关于智库发展建设的看法。

刚才大家的提问中谈到有草根智库的，也有说新华社瞭望媒体智库的，但是我感到，智库的发展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智库要发展，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进行发展，不一定我就是草根我发挥不了作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国外，不存在这个界限。刚才有人提问到 CIU 和瞭望智库，如果按以前的考虑，CUI 是个媒体，但实际上它不只是媒体，它有很深的研究功底，它是经济学人信息部做的研究，有很深厚的研究基础。所以智库的发展是多样的，不是单一的。

第二，智库一定得有自己的专业化、有自己的高质量和独立性研究作为它发展的立身之本。如果没有这三条的话，这个智库很难产生社会影响力，刚才有人问草根智库怎么产生影响力，首先你得有这三条才能有影响力，不是有多少钱、有多大的官才能有影响力，一定得有自己的专业化、有自己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独立的判断。



第三，我们要搞智库，一定得产生作用，这有两方面的渠道，一方面是和政府合作，这是西方智库最大的优势，刚才前面讨论有旋转门，今天我在智库做研究，明天就到政府做官员，所以和政府合作是它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第二是和社会公众的交流和与媒体的合作，因为你有思想、你有一些观点，包括你有一些最新成果，如果不被社会认可的话，你的成果是没有用的，得不到政府的应用，又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你的作用就没法发挥出来。所以和政府的合作和 与社会公众的交流是智库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

齐晔：谢谢姜先生，也谢谢在座的各位嘉宾。

非常感谢今天参加中美智库高层论坛的各位嘉宾以及在座的各位，今天的时间非常长的讨论，但是大家的状态保持得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